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日本人眼中的李大钊

中年的“家欲”危机

资政院：

晚清宪政史的那段往事

分享的潮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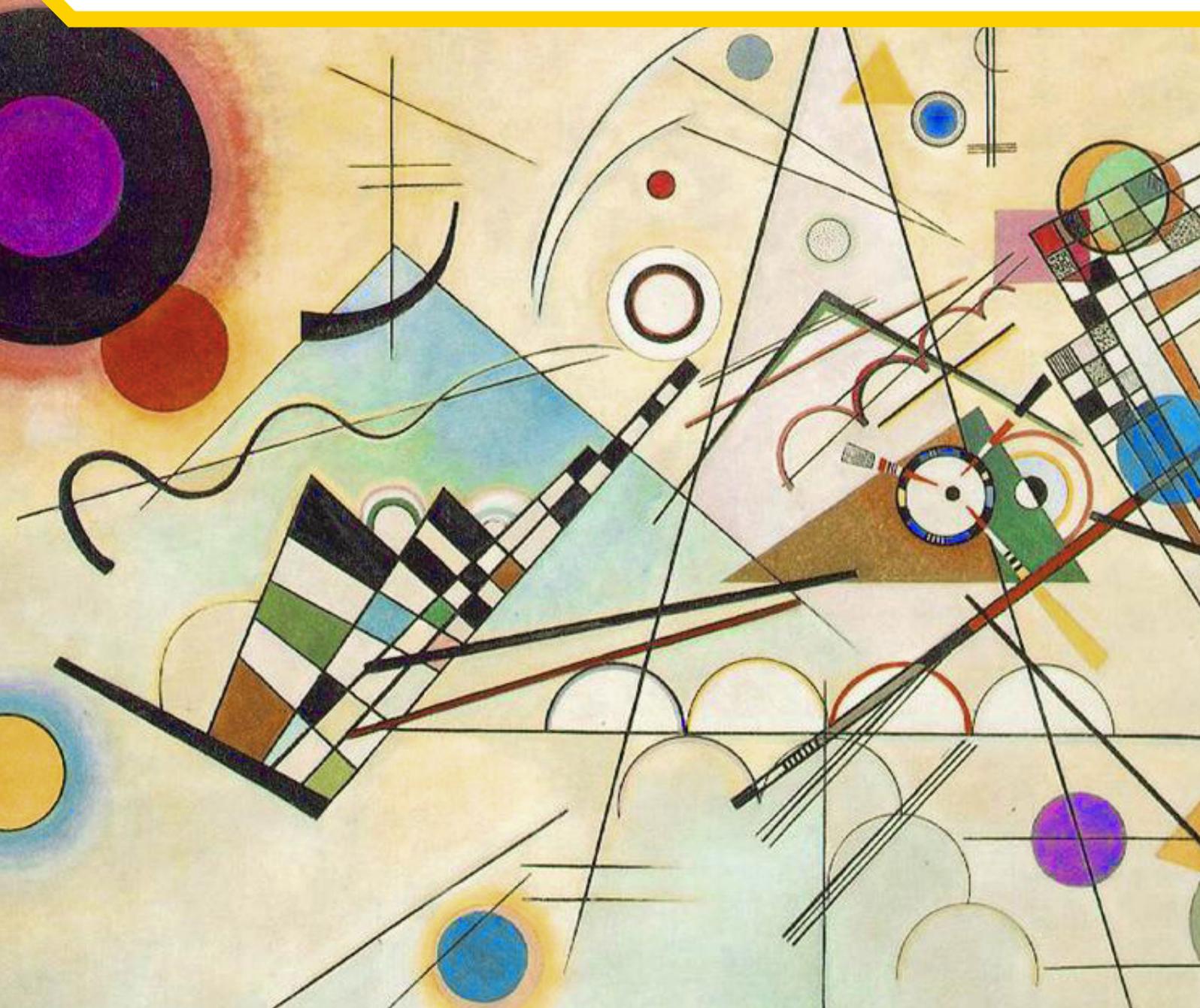
——微博的话语权革命

音乐杂谈

我的巴别塔尴尬

转型年代的文化生活

“独立阅读”书系新书发布暨主题沙龙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庆 言一
汪伟 扬克 孙骁骥 灵子

轮值编辑

孙骁骥

观察员

文学: 朱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 苏小和(北京)
思想: 成庆(上海)
文史: 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羽良(北京)
严飞(美国·旧金山) 刘柠(北京)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扬克(德国·图宾根) 孙传钊(上海)
燕舞(北京) 灵子(北京)
吴强(北京) 言一(成都)

翻译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

2011年11月 第5卷第10期

总第50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 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 观点尊重个人趣味, 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 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 对于相关部分, 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 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 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 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 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 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 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 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 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 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 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 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2012

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2的世界”特刊号上，主编富兰克林在勾勒未来一年世界的轮廓时写道：“世界并不会在2012年终结。不过这个世界会常常给你将要终结的感觉。”对于中国人而言，这种“将要终结”的情绪正像北京窗外灰霾的天气那样吞噬着人们所剩无多的乐观情绪。阅读能减轻这种末世之感？或许不能。但远离阅读的庸众，无疑将会把世界进一步推向“终结”边缘。

在本期杂志正式进入编辑流程之前，“独立阅读书系”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暨主题沙龙。这是《独立阅读》同仁的首次“聚义”，本期杂志也将与读者分享这次活动的文字记录和现场照片。

编者按



目录

封面用图

comp-8

Wassily Kandinsky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经济 • 苏小和
写作 • 朱航满
思想 • 成庆
影像 • 言一

001-020

阅读报告
台港海外

日本 • 刘柠
日本人眼中的李大钊

001-020

书评

• 朱白
中年的“家欲”危机

• 成庆
资政院：
晚清宪政史的那段往事

• 吴强
分享的潮汐
——微博的话语权革命

021-034

音乐

• 马慧元
音乐杂谈

035-048

随笔

• 罗四鸪
我的巴别塔尴尬

049-072

专题

• 转型年代的文化生活
“独立阅读”书系新书发布
暨主题沙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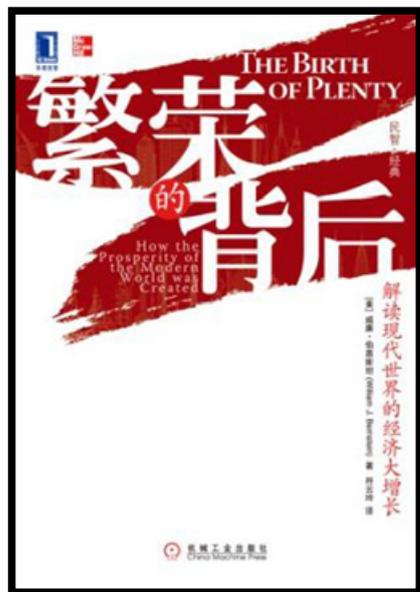
073-083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威廉·伯恩斯坦在《繁荣的背后》(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9月)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值得深度分析。他把1820年理解为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分水岭,准确地说,伯恩斯坦把这一年当成了现代经济的起点。此前,人类陷在一种普遍的贫穷之中,经济学史解释为重农主义时代,产权模糊,技术守旧,市场的交换区域化,且不自由。1820年前后,这样的经济态势出现了革新,人类的财富急剧增长,人类社会用了几千年漫长的时间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徘徊,但却只用了200年的时间,就建立起了叹为观止的现代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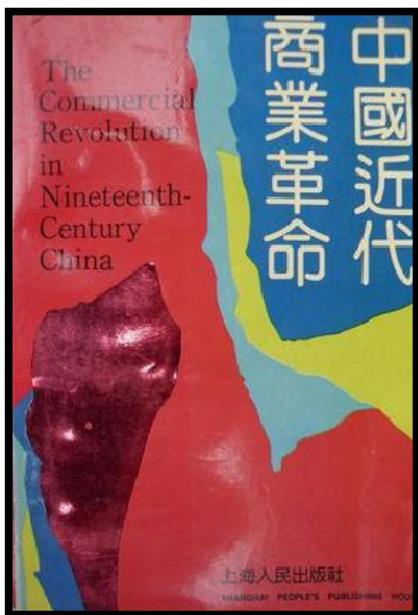
事实上,伯恩斯坦采用这样的叙述视角,可能是受到了麦迪森的影响。麦迪森有一部影响力还不错的著作,《世界经济200年回顾,1820--1992》,这本书也是极力强调1820年的经济史转型意义,其中提到了日本。众所周知,一般性的日本经济叙事,都把日本经济的繁荣锁定在二战之后,但麦迪森不这么认为。历史上看,日本人均实际GDP增长6%,人均寿命翻倍,国民受教育水平历史性地提高4倍,文盲的人群迅速消失,这些都发生在日本明治维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大约40年的时间。

这样的时间分析有意义,我刚好读过一本事关中国近代商业经济的著作,郝延



平先生的《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郝先生上来就说,“在19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市场结构、商业的金融方面、贸易中心、航运以及经营方式的变化,如此广泛,显著和迅速,以至于从总的结果来看,似乎是革命性的。”这本著作得到了费正清的悉心指点,而刘广京教授则提醒郝延平要多注意研究晚清西方在华商行的档案资料,这样的提醒,让郝先生感激不尽。

一个人的阅读生活总是充满了巧合,关于刘广京先生,我手头有一本《近代中国之传统与蜕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8年5月),这是刘广京先生75岁的



祝寿论文集，郝延平、魏秀梅主编，开篇就是余英时先生的文章，《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余先生提到一个大陆读者耳熟能详的历史概念：资本主义萌芽。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这种说法不但是硬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公式，而且是直接为毛泽东的话作注释。毛在1939年所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说，“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句“圣旨”意义的历史学陈述，1949年之后的大陆主流史学界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都是为了要证明毛的这段话是正确的。

余英时先生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萌芽说在其理论上不能成立，国外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便有系统的驳论。毛泽东并不是史学家，但他的说法在1949年后取得钦定的地位，已经不再是一个史学的假设，而成为一种不允许他人发声的“真理”。

我的意思是说，从思想史的角度，余英时先生也是理直气壮的认为，1820年前后才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启蒙年代，而不是中国主流教材所陈述的明朝中期的内生型资本主义萌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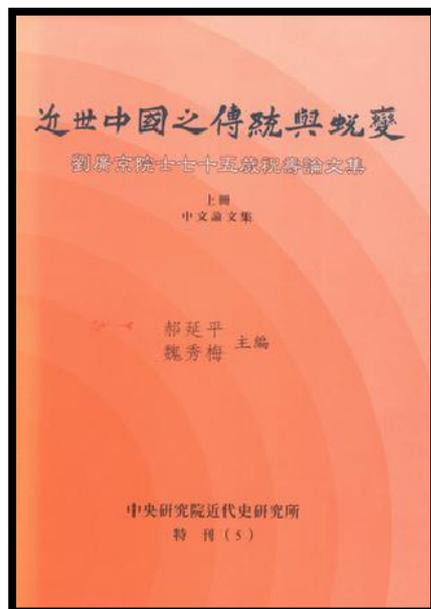
这样的学术梳理，其意义非同小可！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或者说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探索，对现代财富的寻找，在时间的维度上，与整个人类社会是同步的。在繁荣的命题上，中国并不是传统学术意义上的后发国家，今天之所以在市场经济层面相对滞后，其原因不在于起点的滞后，而是过程的滞后，发展过程意义上的摇摆和无知，才是中国经济的病症。

第一次摇摆出现在1883年。从1820年开始起步的输入性商业经济，具有自由市场经济的普遍征象。重要的是，这不是晚清政府的主导行为，而是由外资力量和中国民间市场力量共同演绎了这一段商业发展。所以经济史学家迈克尔·曼曾经说，假设这个过程缓慢延续，不中断的话，中国从19世纪后期就能发展出以本土资本主义为主，同时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挂钩的一种“常态的资本主义”。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几乎接近于晚

清时代的“改革开放”，不过在1883年前后，晚清政府却开始大面积兴起以官商结合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出现了所谓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形态，官僚资本主义在接下来的20多年的时间之内，似乎站住了脚跟，并支持了晚清政府的政治局面，以至于李鸿章在谈及官商结合模式的商业形态时，自认为是中国人在经济领域的新发现。这就是被后人反复研究过的洋务运动，遗憾地是，历史作证，洋务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于外国资本的进入，而在于晚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进工业化，用政府权力主导市场，全面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这样的历史似乎就是当代史，因此伯恩斯坦的观点显得如此重要。他说，从1820年开始，财产权、科学方法、资本市场和交通通信技术的改善，构成了人类经济繁荣的四个内因。这当然是非常具有常识性的分析模型，问题在于，常识的稀缺导致了发展过程的摇摆，100多年之后，差距就变得非常醒目。因此，就在此时此刻，每个心系繁荣的人都在追问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又将出现一次常识的稀缺、发展的摇摆吗？**Q**



观察员 朱白 (广州, youjinma@gmail.com)

当下生活万事无不以“跟风”二字为绳，生活品质可以跟，电影品位、旅行趣味可以跟，读书更是可以大跟、特跟、使劲跟。在一股又一股的跟风书中，想从中辨析出真正的品质和挑选到符合自己喜好，还是真是一件手忙脚乱更是会难免会出错的事儿。比如在近两年的港台作家大热的这股风中，别说有像宣传话语中那么好的，即便真正值得读一读的作家作品也是凤毛麟角。看上去都有一副唬人的皮囊，而皮囊包裹的也大多都是一些腐臭烂肉和软塌塌的筋骨。

在个人的狭隘眼光之下，相比而言骆以军称得上真正值得一读的港台作家，他多年的诸多中短篇就曾在纯文学爱好者那里流行过，但文学期刊毕竟很少流入普通读者手中，这回接二连三出版的作品也算上喂哺一下饥饿的大陆读者了。《西夏旅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遣悲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既满足市场的好奇，又能真正成为值得一读的作品，这不知道该感谢出版者的眼光，还是要感谢这股“劲风”的猛烈。骆以军是少数的真正意义上的有卓越成绩的台湾小说家。他名声早就确立，并在小说这门手艺上不断求新和一直特立独行。《遣悲怀》是短篇小说“串”成的长篇小说，单篇成立，连续阅读当成长篇小说亦是方式一种。在首篇《运尸人》中，骆以军就已经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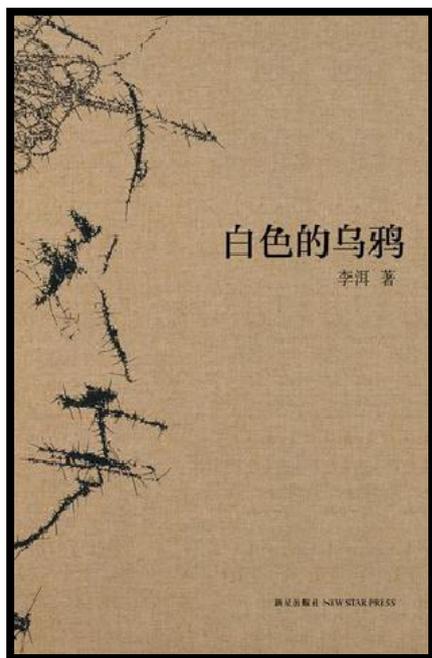


他的读者尝到了厉害，用轮椅推着死去的母亲，去医院捐赠器官，一路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作家与死者对话，更是从这种对话中找到生与死的那条不太清晰的界限，作家要做的就是在这条界限上悲怆地跳舞。

跟骆以军时间轴上同步但风格完全不同的大陆作家李洱，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白色的乌鸦》（新星出版社，2011年11月），从书名上你也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将目光锁定在那些荒诞故事和背离惯性思维上的作家。读李洱的《白色的乌鸦》，首先你能感受到这已经是完全不属于当下的作品，或者说，它们对当下生活、当下文学不会构成任何影响，它们

出生即代表死亡，尤其是这批创作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的短篇小说，从技术到题材，都已经在这二十年的社会生活巨变中显得黯淡无光、颓然萎靡。这也是小说的“悲剧”之一，你极端病态地去揣摩这个时代，用心良苦地去描写她，可却很难在她的肌肤或者内脏上留下半点痕迹。关于生命的孕育是李洱这部短篇小说集的主题之一，比如在颇有实验风格的《你在哪》里，一对双胞胎在子宫里的生活场景，他们肆意幻想、对话，对体外的空间展开微观的想象和观察，这些生命之前的想象是对作家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推测——生命之所以能够称之为生命，他们在生命形成之前是怎样对这个世界进行影响和被影响的。尽管李洱给出了超出读者想象的空间和叙事，但还是固步自封地呆在了自己营造的语境里，令整篇小说在结束之时显得脆弱不堪。

人类作家和学者已经写了那么作品，这是每个人在购书中心之类的地方首先可以感受到的，堆积如山不再是夸张的形容词，而是真切的丈量。那么为什么还有必要一再去新写呢？我们的作家在新作品里面是否有超越的元素？它们是否都有存在的必要？这些问题基本上不可能有人可以回答，即便有了所谓的答案也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大众还是挺难伺候的。尤其在一些古老话题上，很多经典老书或者曾经存在而因我们习惯性忽视而未曾重视过的，反而会显得很有作用力。比如《性与性格》（奥托·魏宁格著，肖聿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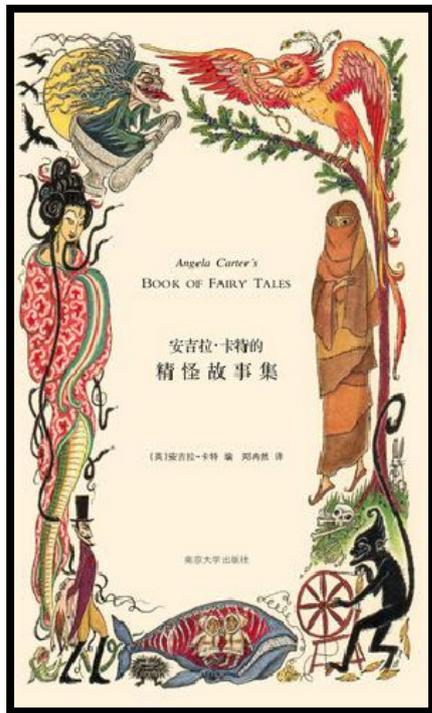


月) 就是一本足以拨开时间迷雾令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作品。奥托·魏宁格是一位天才型作家，他在23岁出版的这本《性与性格》是他唯一一本著作，本书出版后不久他就以举枪自杀谢世。书中论述的话题包括性吸引、同性恋、男人和女人、伦理、两性心理、母亲与卖淫、爱欲与审美……他关注普遍性的性心理问题，更不乏对性的心理和体验的真知灼见。这些论点在20世纪初是反传统的，放在今天也颇有启发性，比如他说：“女人无关道德，这种天性可以通过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女人非常容易忘记自己的某个不道德的行为。”此书某些话题正好可以配合《天南》第四期的情色专题看。

有些文字很难分类界定，比如哲学家让·波德里亚这本《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

出版社2011年10月),它可以是游记、随笔,也可以是批判大众文化的著作,约定俗成的是只要是这个家伙的东西就没办法不让人将之看成是其哲学观的某种呈现。《美国》里包含了这位法国哲学家对这样一个影响人类行为的国度的全部想象力和洞察力。波德里亚的这些文字来源于他的一次数月美国之行,他将自己的不解、发现、归纳、想像全部汇成文字,装订出来的就是思想的鳞片。好玩的是他不仅仅是对美国的文化、建筑、城市好奇,他更是对那里的诸如黑夜、微笑之类的玩意产生非凡的想象力,这也是这本书阅读起来让人非常愉快的地方。从严格的指向性来说,波德里亚在这本《美国》中只给出辨析特质的图景以及这辨析所能窥探到的结果,但基于特质的利与弊他却没有任何办法,至少他没给出他的选择。并非简单的赞同或者批判,波德里亚只是看穿了这世界的一种必然趋势,改变或阻止都不太可能,他感叹“美学的终结”,与意大利“某些已经成为油画的风景”相比,美国的洛杉矶则有“疯狂的、没有欲望的交通”,正如更早的本雅明所说的“韵味的消失”,这是人类史发展的一个景象,只需深陷其中,你不会也无法做出其他向度上的努力。

近来读的愉快和轻松的还有《**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编者:安吉拉·卡特,郑冉然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这不是悬念或者鬼故事之类的书,而是一部收集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民间小故事。他们或生动或简单,大多是口口相传的



凡人琐事。虽然里面还是有一些关于精灵和灵异的故事,但基本上还是可以看成民间百姓之间的家长里短。安吉拉·卡特是英国著名作家,但这本书她的主要贡献不是写作,而是收集和整理以及附在书后的那些属于个人偏好式的注释,她将这些各个年代散落于世界各地的故事收集起来,不加多言,让我们一次性可以看到如此丰富的民间传说,这是一个大作家的善行。与这本书有类似美妙感的还有小泉八云的《怪谈》(王新禧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我看的这个版本有插图,并号称全译足本,读起来赏心悦目),正是日本导演小林正树的同名电影的原著故事。五十篇故事,在灵异的角度上它们称得上篇篇精彩了。Q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前不久，赖声川导演的话剧《宝岛一村》终于回到上海，已经错过两轮巡演的我这次早早订好了票。了解《宝岛一村》本身是因为关注台湾的眷村文化，多年前看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便对影片中的眷村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自己小时候生活的环境，也近似眷村这般的杂乱、温情，更有一帮同龄人的共同成长经验，使得本不相关的台湾眷村景象，在我眼里却演化成儿时经验的翻版，所以当观看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时，对其中的乡愁并无触动，反倒是主人公的成长经验让我看得是泪水涟涟，不能自禁。

看完《宝岛一村》，虽然也在黑暗的剧场里忍不住为“松花江上”掬一把泪，但更能打动我的，还是眷村的生活场景，似乎也不断地牵引着我的记忆回到童年。这种时间的“乡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被高速的转型所撕裂的结果，我们一方面对笼罩性的政治集体主义表示不满，但一方面又感怀儿时的温暖聚落，那些被“规划”的单位与社区，竟能超越政治的操控，浮现出日常经验中的温情。

吴念真不是外省人，但他的新书《**这些人，那些事**》（译林出版社，2011年9月）却符合我亲近眷村文化的理由，即那是一种共同成长的时间体验，除了大时代的政



治背景之外，那里面更包含人生无常的感怀，缘聚缘散的惆怅等生命议题，就如吴念真在的序言中所说，“故事里被我提及的所有人……我只能说：在人生的过程里何其有幸与你们相遇，或辗转知道你们的故事…记得你们、记得那些事，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这一切都已成了生命的刻痕，甚至是生命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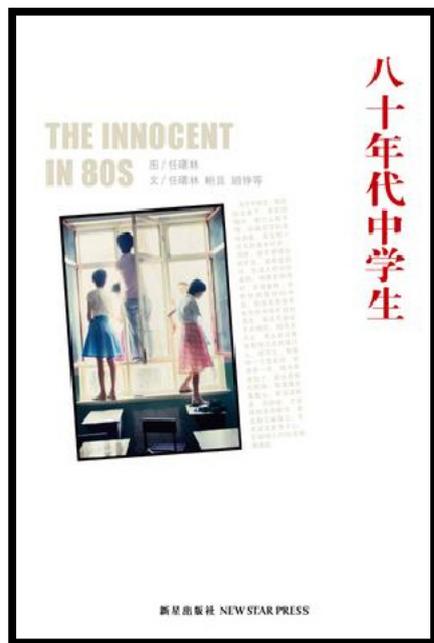
关于“乡愁”，我们一般会以为那是“空间”的转移，但是这三十年的剧烈变化，时间性的“怀旧”和空间性的“乡愁”已经裹挟在一起了，我们这代人对于故乡的怀念，对儿时成长环境的不舍，对“曾经的故乡”的留恋，都显示出今日国人的“乡愁”不仅与空间相关，也与时间维度

相关。幸好在我们成长的岁月过程中，已有人开始用影像开始记录“时间”，任曙林的《八十年代中学生》（新星出版社，2011年10月）中的相片，本与我的成长过程存在细微时差，只能算赶上八十年代的尾巴，但我的兄长、姐姐却是完整地度过八十年代的中学生涯，因此其中的许多影像，有的像似自身亲历，有的只能借助兄长辈的眼光回忆起某些场景。不过正如某些朋友所评论的那样，这些影像虽能涵盖某些时代的普遍记忆，但却因为摄影师本人的“主体缺失”，而让这些影像流于一般性的怀旧，的确，“时光是有重量的”，但时光本身所存现出来的无常与易逝，假如无法辅以足够的诠释与说明，那么“时光”也可能变成轻飘飘的“流水无痕”，这样的“时光”，又是否太过轻泛了呢？

的确，“生命的意义”需要一点重量，在史铁生的表述中，“意义”最终就是在于这些许重量上，在他的《爱情问题》（凤凰出版社，2011年11月）中的“墙下短记”中，他这么说道，

要求意义就是要求生命的重量。各种重量。各种重量在撞墙之时被真正测量。但很多重量，在死神的秤盘上还是轻，秤砣平衡在荒诞的准星上。因而得有一种重量，你愿意为之生也愿意为之死，愿意为之累，愿意在它的引力下耗尽性命。

史铁生所要求的“重量”显然是要面对生与死的议题，相比而言，今天的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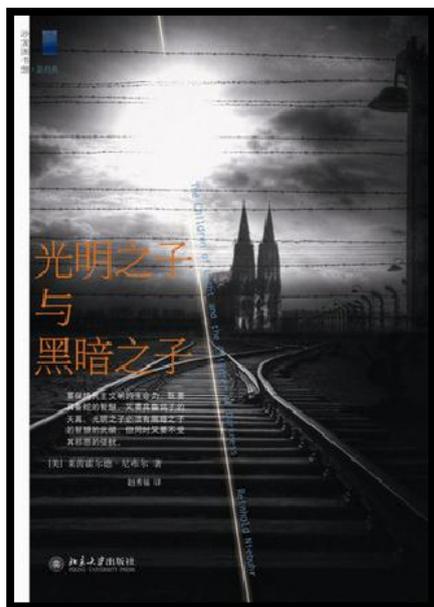


在意义问题上是否又太“轻”了一点呢？

让我们还是继续怀旧吧，记得几年前，应星曾写过一篇“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历数今日学界成名者之堕落，不仅对后辈无提携之功，反而汲汲营营，以利益为先导，以名利为宗旨，全无学人之风范。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读赵越胜的这本《燃灯者：忆周辅成》（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才让我们猛然惊觉，传统师生之间那种相响以湿、教学相长的情谊并非只是传说，而是中国师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惜乎今日已难再见！为何会如此，我想关键之处还在于学术失去了对“人性”的关注，对人类命运的关切，最终只能沦落为一地鸡毛，满目苍痍，谁之过？归根到底，还是学人自身之过。值得强调的是，这本集子只是港版所收的部分内容，对于那些

“好奇心”更强的读者，理应去读赵越胜的那些被遗漏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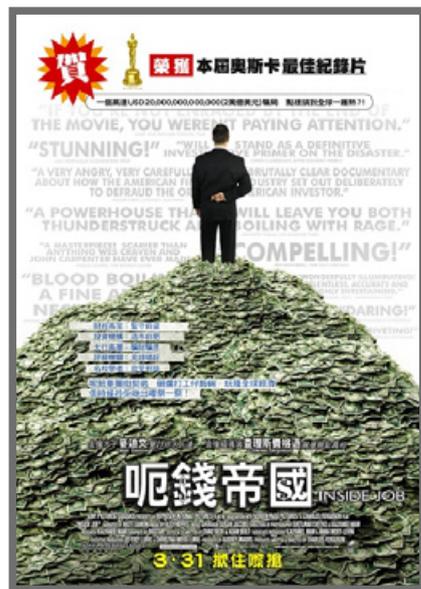
最后介绍一本“有重量的”思想史著作，本应早点介绍，但却一次次地忘记，即著名神学家尼布尔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赵秀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按照他的观点，现代社会中的许多政治激进主义思潮，大体上可用“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来形容，所谓“光明之子”，是指那些相信超越一己之小我的最高原则的那些人，而“黑暗之子”则是指不相信此类原则的人们，尼布尔认为那些不相信更高普遍规律与原则的人常常利用人们对“光明”的渴望行“邪恶”之实，而“光明之子”们却单纯地相信道德教化可以扭转黑暗的现实，而放弃现实的政治斗争，因而常常是天真与愚蠢的。因此在这两者的比较下，尼布尔提出了一种中道的民主理论，即视现代民主为一种调和“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现实出路。明眼人或许已经察觉，著名思想史家张灏先生的“高调、低调民主论”与“幽暗意识”等等，实乃与其师尼布尔有一脉相承之处。Q



观察员 言一（成都, richard7briner@gmail.com）

《监守自盗》，《大而不倒》，再加上《利益风暴》，通过电影对华尔街进行的清算或可算是抵达高峰。尽管无法判断《监守自盗》对此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起了多少的推动作用，但无疑这是一部立场最为明晰，提问和问责都最为直接的影片。在这部影片的镜头之下，华尔街的高层均被划归罪犯，而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各路经济学家亦难辞其咎。看着本科时的偶像在镜头前言语稚拙，脑海里瞬间想起的，则是另一部出自格雷厄姆·格林编剧的经典影片《坍塌的偶像》。只是，这样的一种坍塌，并非全然来自少不经事与成人世界之间的落差；更多地，我看到的是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伦理之变与代理之伤。

该从何说起呢？此刻的我，全然无心像《大而不倒》那样去回顾或是重建危机爆发前几日里白宫政要与华尔街巨头的各种举措，无心去追溯自里根时期开启的放松管制政策，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纳斯达克曾经呈现的那些泡沫，我甚至毫无动力去分析或回答《监守自盗》在片末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恢复和加强对衍生品的监管，就能避免下一次重蹈覆辙？坦白讲，基于我在心理学方面的阅读，我对此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人类过往的所有历史证明的只有一件事：人类从未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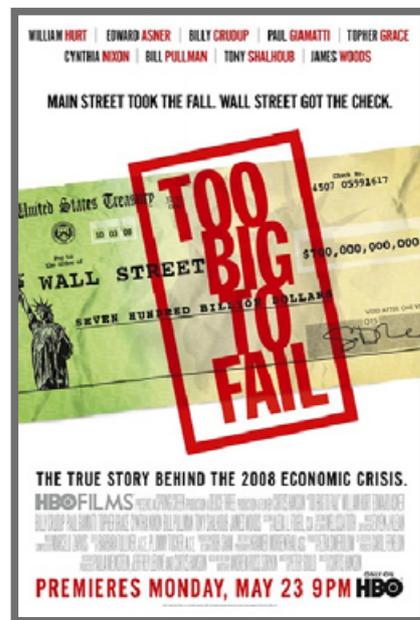
然，我也愿意在更为具体一点的层面引用波斯曼的论断：用新技术来解决旧的技术问题无疑是饮鸩止渴。

在《利益风暴》中，有一个让我十分触动的镜头。那是Seth和Peter奉命去寻回那个熟知一切却又刚被解雇的同事，看着车窗外的城市，看着灯光掩映中熙来攘往的人们，Peter喃喃说到：看看这些人们，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一觉醒来之后，会发生什么；彼时，Seth仍恋恋不舍地喝着手里的酒。这句台词内里的精英腔调，尽管非常地政治不正确，却丝毫不减其吸引力。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对城市的俯拍镜头，董事长的从天而降，高层们在大厦顶层落地窗前做出的公开或私下的协定…似乎也正暗示着普罗大众的

生活确实有被这样的一群人所深刻地影响乃至操控着。若再结合我们生活中的经验，为何几乎所有金融业的大厦都占据了一个城市最为繁华和最为核心的区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一个城市的天际线呢？纽约的曼哈顿，香港的中环，上海的外滩……无一例外。这一切或许并未直接决定什么，但显然足以反映当下的什么。

仿佛是在回应现实中危机爆发后大众铺天盖地的谴责，在《利益风暴》的后半段，却有着这样一段针对普通大众的凶猛逆袭：“*People want to live like this in their cars and their big fucking houses that they can't even pay for? Then you're necessary. The only reason they all get to continue living like kings is because we've got our fingers on the scales in their favor... They want what we have to give them, but they also want to play innocent and pretend they have no idea where it came from ...Fuck them. Fuck normal people*”。

其大意为：人们能享有目前的住房，汽车和各种生活便利几乎都是拜金融业所赐。大众渴望享有这一切，却又要装作不知道自己的住房，汽车究竟是怎样来的——也即，一旦金融危机，他们很可能会宣称自己受了欺骗，比如《监守自盗》里提到的所谓掠夺性贷款。



对此，也许需要一分为二的视角。首先，金融所具有的跨时间配置资源的能力和金融服务所带来的便捷都是毋庸置疑的；同时，证券交易本身亦是一门技术含量较高的手艺活，需要专业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窃听风云2》中刘青云对古天乐露的那一手便是最佳的例证——显然，换成古天乐自己，是绝对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让自己手中持有的证券增值的；作为一个外行，他甚至无法理解上述的增值是如何发生的。试想，如果刘青云只是现实中的普通证券经纪人，古天乐也只是一名普通的潜在客户，那么面对刘青云所展现的专业技能，古天乐通常不会产生任何抵触，反而会选择更加信任刘青云，让他作为自己的交易代理人。然而，上述这种基于专业分工所形成的代理机制，却也正是当下

许多服务行业之所以会引发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专业化已经足够深入的今天，普罗大众，至少他们中的部分人并非是故意地 play innocent，而是切切实实地不了解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潜在后果。以国内而言，保险业的纠纷数不胜数；而在07-08年我亦亲身见证了开放式基金推广中的所谓口口相传：那些月薪不足千元的大妈们在周围人的影响下纷纷拿出自己的积蓄去购买基金，每日股市的涨跌成了她们饭桌上最为关注的话题，而她们关于股市或基金的消息来源几乎都指向某个银行证券业的从业人员。可是，当基金业务推广被纳入银行业绩考核，又有谁能保证这些从业人员在进行业务解说时不会有所保留和隐瞒？

即便是金融业的从业人员，其自身亦未必是“信息完全”的。当专业分工发展到极致，许多业务的开展并不需要业务员真正去了解这项业务本身，只需要遵循已经撰写好的业务规程步骤就好。所谓的业务培训，基本只是规程的介绍，实际操作的演习，至于一种具体的金融工具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如何演变而来，则被彻底地抹去。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鲍曼曾指出：大屠杀之所以可能并非是因为所有参与的德国军官都天良泯灭，他们之所以成为了杀人机器的一部分，恰恰就在于他们每个人都只是一颗螺丝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无需直面杀戮的场面，无需直面生命

的消失。他们所做的无非就是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而已。类似的，许多金融业的从业人员也都只不过是在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外加努力提高自己的业绩而已。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会去关心，比如杠杆比率的不断攀升究竟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出于对专业化的认同和信任，我们几乎毫无保留地信任所谓的专业人士，将生活中的许多事务都交由他们去打理，而他们亦在许多领域成为了我们的代理人。当危机爆发，纠纷来临，许多人都深感被自己的代理人所背叛，愤怒地发问：为什么作为专业人士的你们竟然没能预见这一切的来临——做出上述发问的，除了普通的投资者，亦包括英女皇。在这当中，欺瞒和背叛固然存在，但我们是否也应当扪心自问：是否这根本上是因为我们早就背弃了自己，把太多原本重要的东西都经由代理制度，以专业化的名义，交到了别人的手里。用句理论一点的话来说，作为单个的主体，我们是否应该为自己的外包程度设置一个阈值？

回到《利益风暴》，影片的原名叫做《Margin Call》。在经济学里，margin有利润的意思；那么margin call连起来，也就是利益在呼叫的意思。利益在呼叫什么呢？或者，我们应该问：是谁的利益在呼叫呢？这正是影片末尾交易部主管Sam需要面对的问题：面对即将崩盘的金融市场，究竟是抢先一步清仓保证自身的利益，

还是守住交易的伦理去照顾交易伙伴和其他普通客户的利益。两方的利益都在呼叫，Sam需要决定的是究竟该拿起哪一个听筒。同时，margin也有边际，边界的含义。故而，在我看来，这事实上暗示着当每个人做出这一与自身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决定之时，也同样做出了关于自己站在伦理边界哪一边的决定。

整部片中，没有任何好莱坞意义上的英雄。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自利的主体。无论是曾经的桥梁工程师，还是从业30年的部门主管，都做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因为他们既不用面对《监守自盗》中失去房屋的主妇的哭诉，也不用像《大而不倒》里的保尔森那样需要面对法国财长的怒火；他们在分工和代理制度的保护下得以免于良心的叩问。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承认：专业化工作细分下的自利行为已然成为了主宰当今社会的伦理，而它看上去又是如此地理性，客观，乃至十分形似于韦伯的所谓“价值中立”。只不过，我个人却更愿意称之为：亚当斯密的失败与伟大。

金融衍生品或许风险难测，但电影衍生品有时却是妙趣横生。在此谨推荐一部



2011年的新作《捕蝇纸》——片中的银行劫匪正是受到金融风暴影响才不得不重操旧业——其编剧则是此前借着《宿醉》1、2大火的年轻剧作者(88年生) Jon Lucas。尽管整部影片或可被概括为无厘头银行密室推理劫案，但其所有黑色的光芒却是被收敛在了别出心裁的片头里：面对美钞制成的捕蝇纸，我们是否应当在入局前想想自己要如何才能避免成为易粘的无头苍蝇呢？ Q

日本人眼中的李大钊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研究，大约在1920年前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李大钊在1919年下半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翌年1月写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里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经济决定论’尚存有疑问，而在1920年，他就消除了对唯物史观的怀疑……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也与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样更加强化起来。”

所谓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是指1920年底，李大钊加入了社会主义者大杉荣、堺利彦等在东京成立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据现存日本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该同盟的花名册显示，有几位会员的名字疑似中国人或朝鲜人，但著名者只有李大钊。另一位当时滞留北京的日本人会员是丸山幸一郎（1895~1924，笔名丸山昏迷、昏迷生），是当时的日文报纸《新支那》和《北京周报》的编辑、记者。石川认为：“可以肯定地说，介绍李大钊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就是这位丸山。”

丸山昏迷在北京的日本人圈子里很有名，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资源，其本



人的名字，也曾在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中多次出现。当时也住在北京的日本著名教育家、樱美林学园的创立者清水安三（1891~1988）回忆说：“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许多日本的思想家和文人来游，都是丸山昏迷君陪他们到周作人和李大钊先生家里去的。说实话，我自己也是该君陪着去拜访周作人和李大钊的。”

清水其实与李大钊是老相识，早在李留日时期，便曾登门拜访过他。当时是通过另一位丸山——丸山传太郎牧师的介绍，李大钊就住在这位丸山牧师所开设的丸山学寮里。学寮位于山吹町，离李就读的早稻田大学很近便。两层小楼，面积不小，约

有四十坪，住着几名中国留学生，身穿立领学生服的李大钊是其中一位。每逢周日，便在楼上两间相通的房间里举办主日聚会活动，日本学生总有十数人参加。清水印象最深的是，唱赞美歌的时候，李大钊弹管风琴为大家伴奏：“看着这位日后的共产主义者‘大物’，在周日学校里弹奏赞美歌，那真是有趣的光景。然而过去的信主之人，却转向成了社会主义者。”笔者从未见过对早年李大钊皈依基督的记录，但早稻田时代，李确实曾修习过著名基督徒教授阿部矶男的社会政策课程。

多年后，清水再次见到李大钊，是在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做东的、为日本客人接风的宴会上。七八个人，都是从日本回来的“海龟”，因为是欢迎日本人，所以宴会上大家都说日语。久别重逢，不胜唏嘘。两人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从此过从颇密。

清水去李大钊家，即使没有二十次，也有十四五次，他说：“那时候，我经常和丸山昏迷君、铃木长次郎兄一起去拜访他，他的家是我们在北京最愉快的去处之一。”李大钊家位于在《鲁迅日记》中屡屡出现的山本医院附近，西单往北，第一个或第二个胡同向西拐，一间朝北的屋子。中等人家的模样，与陈启修、胡适的宅邸相比，朴素得多。门柱上有孔，孔里穿着铁丝，铁丝的先端系着一块小木牌，一拉木牌，便响起“叮铃铃”的铃声。

清水跟李大钊用日语交谈。李的日语

虽然不像鲁迅那样流畅，倒是都明白。跟李夫人说话，清水则用中文。夫人是李10岁时，奉父母之命娶的童养媳，年长李大钊6岁，是一个很普通的女性。在清水眼里，李大钊是一个像日本乡下的村长一样平凡可亲的人。“他静静地说着话，不是那种双目炯炯、慷慨激昂的类型。即使谈左翼的话题，也绝不激动。他不会让对方感到紧张，相反，是一个能让人松弛的、什么都能聊得来的人。”所以清水不仅自己再三再四造访，有时还带朋友一块过去，引荐给李大钊，如政治家鹤见保祐辅和一桥大学教授、经济学者福田德三等。

有两个细节令清水安三记忆犹新。一是李大钊甚喜日本的吃食，尤其是和菓子（一种日本甜点）和日式馒头，经常从东单的日本店里购买。偶尔清水也买些日本食品作为礼物带去，深得主人欢心。二是李大钊的阅读量之大令人吃惊。罗素访问中国时，清水只读过其《自由之路》、《形而上学》和《哲学问题》等3部著作，他却把其所有的著作都读过一遍，而彼时很多书根本未译成日文。李大钊还用英文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他固然是读书家。但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活动家一类的人物，具有能让青年献出生命的人格魅力。”

清水与李大钊相识相知多年，私交莫逆。李大钊爱读日文书报，常从东单三条附近的面向日本人的东亚书局购书，可那里毕竟店小品种少，殊难满足需要，有时便托

清水从东京的书店订购。清水曾自掏腰包为李大钊从日本国内订阅过堺利彦主办的左翼报纸《平民新闻》。共产主义者、前日共委员长佐野学从国内流亡到北京时，起初由中江丑吉照应，但旋即便难以藏身，清水托李大钊帮忙，李遂安排佐野经天津逃往苏联。佐野从北京站出发的那天，李大钊特意派一个青年送行到天津。那青年身材颀长，穿着硬撅撅而又肥肥大大的衣服。多年后，清水听说当年在李大钊的斡旋下，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事情，不禁突发奇想，觉得那青年有可能就是毛泽东，不过似乎时间不甚一致。

1924年，清水赴美留学。行前去向李大钊告别，李托他在美国搜集些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大概由于若是书的话，可以订购，而这种小册子是非卖品，在中国很难入手的缘故吧。刚好京都的西阵教会有两名牧师先期留美，其中一位叫浅野的，在芝加哥转向为共产主义者，于是便托这位浅野牧师搜集了一批，然后再由清水设法寄给李大钊。清水后来回忆说，不成想赴美学神学的自己，为了友情，竟“僭越”至此。

两年后，清水从美国再次回到中国，正值国民革命开始北伐，因作为《读卖新闻》、《北京周报》的特派员南下，而错过了与李大钊重逢的机会。1927年3月初，清水曾致信李大钊，力陈藏身东郊民巷苏俄大使馆之不靠谱，劝其南下，但他很可能未收到此信。



清水回到北京，便接到了李大钊惨死的噩耗，心如刀绞。“是夜，我无论如何无法入眠，往日的会面历历在目，不禁失声号泣。阿道夫·哈纳克说，只要翻开历史，便可见文化的街头必立着鲜血淋漓的殉教者的墓碑……”李大钊牺牲两周后的5月8日，清水在《北京周报》上发表了《李大钊之死——其思与人》一文，痛悼亡友。

作为日本人，清水看到李大钊死后，其夫人对何谓革命、为何牺牲等问题似乎很茫然，只是说“守常迷信共产”，哭

个不停，他为李夫人不能像何香凝夫人那样以凛然的态度，面对并礼赞丈夫的死而略感遗憾。

清水安三是战前一代“支那通”，精通中文，在中国生活逾十载，交游甚广，人脉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在他的眼里，伟大者、威严者、霸气者所在多有，但李大钊作为青年时代便结识的诤友，始终是一个亲切、随和、老成持重的东洋“村长”形象。乃至他多年后翻阅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李大钊的传记和党史材料时，大感意外，与自己早年的印象无论如何对不上号。他自己的解

释是因为李是毛泽东的老师，因弟子的“伟大”而“伟大”。在清水的印象中，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独秀是个人物。也许是年长者的缘故，“是很难亲近的了不起的人。霸气满满，相貌堂堂，让人不得不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彬彬有礼。跟与友人很容易熟络亲热的李大钊相比，感觉真不是一个档次”。“可要说真正的大人物，无论如何当推鲁迅。那种伟大的人物，我想日本是出不了的。虽然缘慳一面，毛泽东恐怕也属此类。至于李大钊这一级的话，日本应该也有不少吧。”



中年的“家欲”危机



观察员 朱白（广州，youjinma@gmail.com）

中年男人，人生到了似乎可以停住脚步观望周围美好的年纪，这样的年纪当然也是屡尝人间新鲜和盛开的年纪。但没人规定“是该如此”，所谓理所应当自然不合乎情理，一个男人到了中年就可以“仗势欺人”在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之后还要给人间流露些许猥琐和龌龊，这当然是还没有成为中年男人的那些男人所不许的。有人说中年男人不存在什么危机，身体能搞、物质基础牢靠，正是所说的人生美好季节，但从“我手写我心”的角度来说，格非、张旻、苏童等一批作家到了中年时期，他们写到中年男人的种种不安、聒噪都是情理之中，而往往能够打动作家的故事又是那些卑微的、凄苦的，甚至凌乱的，那自然就是所谓的“危机”。

格非的《春尽江南》正是这种在作家本人人到中年之后的长篇作品，事关当代，但又并非处处触碰所谓的社会危机，他更关注的是“人”内心的危机。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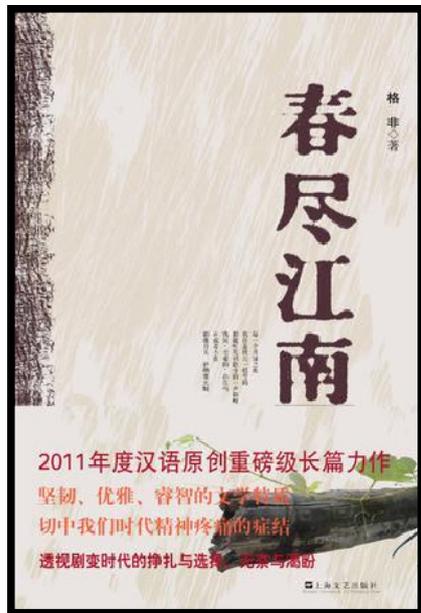
之身体在机能尚且完整运转内心世界无比巨大之时，他的注意力也自然更多的集中在精神感受上。包括我们对物质的迷恋、对名牌和奢侈品的专注，都可以放在身体的另外一个角度上——精神——去理解，它们呈现出来的都是我们对内心的一种感受。

有人说中国当代这么多奇幻的题材，甚至它们是人类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文学史上未曾描述过的，为什么当代作家面对如此时代却长久缺乏表现，他们在显得无能的同时更是表达了一种懦弱。我倒是觉得，当代社会题材当然可以表现，但也不一定就得人人沾之，其实我们并不缺少囿于时代的作品，你看那些花花绿绿的畅销书不是也有黑社会、拆迁、暴力等题材吗，问题不是你写了什么，而是你的怎么样。换个角度来看，怎么写、写什么是作家自己的事，你愿意追随宏大的时代脚步你就去追随，你愿意

关注内心的片刻感受你就去关注，这些都可以做的很好，也可以做的很糟。再退一步讲，所谓的社会题材只是文学命题的一种，如果满眼尽是整齐划一的揭露、戳穿、颠覆，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另外形式的荒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比这些都要客观、宏大和深厚。

所以，我不觉得格非如此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代人甚至个人的内心感受上有什么问题，这本书也并非宣传中所说的“探索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演变的”作品，它不可避免的跟当代社会发生了关系，但它着力点更是在个人的内心和周遭、境遇的改变上，荒诞、炎凉、悲戚，这是人类的共同命运，无论你怎么挣扎这一生，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格非用长篇小说，用跌宕的情节，用有人情味的故事，用善变和讨好的语言，用简单明了的因果关系，充分表达了这样一个核心内容。如果像书之封底介绍说的那样，“深度切中了我们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格非的这部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则会显得很轻薄，甚至在“时代症结”的衡量标准下称之为一部失败的作品也理所应当。但幸好这种概括不一定是作者的意思，这部长篇小说的核心部分，跟症结或者时代关系不大，它是人的小说，它是关于人的情欲、关于人的感情、关于人的家庭等等原始问题的小说。

关于家庭的欲望、在家中发生的欲望故事，在生活中不见得在人人身上都有精彩发生，但至少是无法回避掉的一个常态。《春尽江南》主人公“端午”有



格非，《春尽江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年8月

家也爱家，他和辗转结合的老婆有一个体面的家，家中有无比疼爱的儿子，还有虽拌蒜不断但也算和谐顺畅的妈妈，可家中之欲正待爆发。曾被“端午”遗弃在荒郊的老婆“家玉”是家中之欲的参与者，甚至她和“端午”一样都是所谓家欲爆发的缔造者。“家玉”借北京开会认识了年轻的情人，激情一夜，暧昧而还原了人类原始的冲动，娇嗔而坦率地爱欲成河，你不能将之全盘否定，甚至无法当机立断判定这并非美好——“家玉”在爱欲危机之中妥当地扮演了她所能扮演的那个角色，蒙骗丈夫，激情会友，尽情甚至嚣张地释放，斩断情缘，坦率面对……你找不到“家玉”有什么不妥之处，只不过她可能仅仅是“端午”前后出轨和暧昧的一个借口——作者的安排尽显跌宕起伏

伏情节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失去了人性原本存在的张力。

与格非同时代的作家，当年风声鹤唳的一代先锋小说家，如今尚有如此创作热情和成果的不多。格非应该算是其中挣扎掉时代束缚的少数作家。今天已经没人再会去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形式去写小说了，但过往的精彩和辉煌一定会令人怀念，甚至从精神上难以摆脱。可谁又能说清楚眼下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小说呢，“与时俱进”对真正的作家来说并不一定是个好词，它有时候更会成为笑柄和显得轻浮。

不能说格非的新长篇有刻意讨好读者的嫌疑，但至少他在文字和故事结构上的确做到了比以往更通俗易懂，还有恰到好处煽情，估计也会令格非的读者呈现出扩大化的意思。一位爱读书并对书中人物“绿珠”无限好感的上海女孩，在小说并不复杂但足够煽情的情节过后，对“家玉”的死以及她所采取的死法伤痛不已，蒙头大哭是她的读后感之一——这当然是煽情的好处了，格非用力抓住了敏感的女性读者，也用他所擅长的充满迷醉的表达方式吸引了文学青年的拥戴。

问题也不在于在争取读者这件事上做出的努力，作家用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令更多的人去喜欢他，这个在古今中外都没问题，问题是如今谁还有兴趣去了解一个诗人的生活以及他眼中的世界呢？《春尽江南》以一位在地方志工作的中年诗人为叙述主体，“端午”眼前的世界就是这部小说所要展示的。“端午”写诗的才华不



图为格非近照

用评价，他以诗人身份去生活才是值得琢磨的事情。即便诗人，对这种或几分熟悉或几分向往的生活，也无多少兴趣去旁观阅读别人的“诗生活”吧，他们有功夫还不如自己去参加必有老板参与的那些华丽而堂皇的诗歌节呢

这里的描写除了对没有小说中的诗人那么高级的现实中诗人来说，可以提供一种庸俗的模板以外，还能有什么功用呢？如此说来，小说的诸多情节倒可以给当下诗人活动家们提供一个样板工程去参观学习，如何组织聚会、如何运作诗歌节、如何成为这个时代里光面堂皇但依然是诗人的行为准则。出口成脏、以庸俗当见识的报社社长“徐吉士”，用流氓手段忽悠起来诗歌研讨会，这些小说中的情节成为当下有志之人的教案以备学习，应该是小说中这类描写最积极的一项功能。

诗人“端午”在招隐寺征服文学女青

年，再凌乱地抛弃她，时光跨越到二十年后诗人与这位曾被抛弃的女青年的婚后生活，他们生存在当代中国过分粗暴的现实中，孩子、父母、同事、朋友以及周遭的一切遭遇都难免染上一层“诗人看世界”的色彩。在家庭生活中，“端午”尽力做好父亲、丈夫和儿子的角色，虽算不上强悍，但至少算是合格；在朋友中，他敦厚老实，不张扬不虚荣；在单位则更显得与世无争慈眉善目。风趣、善意、与世无争是他身上的标签，尤其是有一个在事业上强悍的老婆，他就更需要这样一个性格来维系生活。

当身边出现诸如拆迁、上访等跟当代社会息息相关的关键词时，“端午”更是无一例外地暴露出他与世无争的性格来，他不对这些发表看法和意见，更多的是侧身“躲过”，但作为读者无疑你又会觉得这绝对不是一个猪脑的人。“端午”的软弱和中庸更可以看成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之一，他们不报任何幻想，更不愿意献媚，与其说屈服，他们更愿意承认自己是了然一切之后的放任和犬儒。这种看似聪明的态度，实则常常给人以愚蠢的把柄。“端午”的诗无关时代，“端午”身在时代之下却无视时代痕迹，这里只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已经通过某种意外或者策略成为这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让一个聪明人软下来，看来历代用的都是同一个办法。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所有有关拆迁的案子，一概不接！”中国作家或者说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这个盛况空

前的当代中国就只有这么大的力气了。一方面意犹未尽地舔尝自己那些所谓诗人身份下的悲伤与感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忍心就这么放弃如此斑驳的社会现实，那么浅尝辄止则是一种超级省力讨巧的方式。

在地方志工作的主人公，自然可以优雅熟练地观望自己的人生，即兴的幽默和艳遇也自然是情理之中，除此小说家还有安排一些与社会景象近一点的身份，比如报社社长“徐吉士”，身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老婆“庞家玉”，他们即参与社会景象的缔造，同时也成为一种视角去观望这个社会发生的巨变。但是这些都是浅尝辄止的证据，与其马杀鸡般的抚摸不如放弃做到真正的视而不见，个人觉得，格非处处小心又不忍放弃的做法，除了讨好那些浅薄的读者以外，对于小说本身来说实在是看不出有任何的好处。

《春尽江南》跟很多当代题材小说一样，难免要写你我身边的那些丑陋的人，他们极尽猥琐之能事，这也是读这类小说时常要犯恶心的原因。作者写的越好，这种恶心情绪也就越猛烈。《春尽江南》中的“绿珠”是唯一让人无条件喜欢的角色，尽管她数次找不到自我，愿意以放逐的方式去伤害自己、背叛他人，但这是一个善良和单纯得让人发慌的女孩，也就是说她身上有一种罕见而纯粹的美，她越不靠谱，越离这个斑杂凌乱的世界越远。格非在对她的刻画上有了出人意料的美，更有超脱现实的命运安排。

我以为在一部小说的最后出现的人

物并交代其结局的，都是重要人物。“绿珠”毫无疑问是作者用力去写的一个主人公，格非最后这么给“绿珠”做以交代——“她已经联系了沈家巷一家街道办的幼儿园。他们欢迎她去那儿当一名老师。绿珠告诉他，几年来的漂泊生活，让她感到羞愧和疲惫。她希望在鹤浦定居下来，过一种踏实而朴素的生活。她还强调说，在当今时代，只有简单、朴素的心灵才是符合道德的。”我以为，“绿珠”这是一个成功并触碰到了当代青年人心灵的一个人物，不是神来之笔也是苦心营造的一个人物。没有这样的结尾，于人物是残缺，于小说是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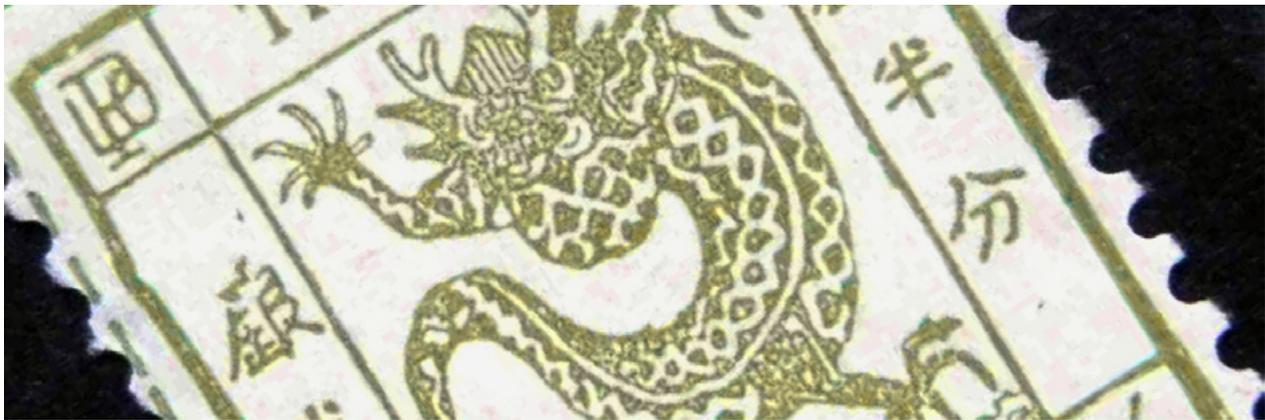
格非无疑是当代作家中的学者型作家、文笔老练的高手、善于思考的智者，但这离我们心目中的睿智、坚韧、优雅的大师作家还有距离。他不断问世的作品，没有真切问候这个复杂甚至迄今不可描述的时代的笔迹，没有成为当代国人生存迷离之时的一种力量，没有在通往人性的长途客车上让我们找到一点先贤的踪影，没有在琐碎卑微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记录……就《春尽江南》来说，格非所动用的心力对于他那样的作家来说太微不足道了，留给读者的期许之后的遗憾也就越发明显。

对格非这样的作家寄予希望，并非读者的一厢情愿，从世俗的角度来说，他早已功名成就坐拥人间真善美；从功

力角度来说，他是从上一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作家中气息尚存的一个，对于那些对中国文学尚存余念的读者来说，对格非寄予希望都是情理之中。但上述评说里你看到了，不尽人意是主调，他能更好，却在更好的路上轻易就折腾死了自己。如果非要对比，近来出版的另外一位作家李海鹏的《晚来寂静》似乎在更妥帖地记录了“人”，相比大时代叙事、空洞的时代记录和不尽如人意的诗人内心独白，凡人的个人成长更是一种低调但却不可或缺的印记，从卑微中洞察出人性的幽暗之光，这是优秀作家的品质。如果加上个人主观色彩，我更喜欢另外一位更年轻作家曹寇的作品，《越来越》尽管是部短篇小说集，但里面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更有一种相对这个时代来说悠长的回味。他们不是悲剧的主角，却在接二连三地上演充满悲伤的戏码，他们面目模糊，却更似你我，从城乡接合部缓步走来的不是什么风云传奇，而是带着你我身影的凡人肉身。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寄希望当代作家作品其实对当下现实的一种绝望，作家从本质上来说也是绝望之人，他们更非圣徒也难轻易就给出我们一把打开迷雾之锁的钥匙。格非、李海鹏、曹寇都不是救世者，他们给出的也只有一份坦诚的绝望书，时代之困的呈现和破解需要更多的作品。Q

资政院：晚清宪政史的那段往事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在近代宪政史上，晚清的预备立宪虽算得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因革命史学之故，谈预备立宪以及国会请愿，大多只是为了铺垫辛亥革命的大势所趋，对于预备立宪期间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国会——资政院，一般只是当作历史转型期的昙花一现，轻描淡写过去，就如史家李剑龙的名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里，资政院的作用与当时的影响几乎未置一言，这显然与资政院当时的真实面貌并不符合。

在短短三个多月的资政院院会期间，民选议员的表现显然超过今日国人对政治运作的想象，不仅当时媒体舆论多有报道，且有所谓“资政院三杰”的说法。三位民选议员，江苏的雷奋、湖南的易宗夔与罗杰在资政院里表现亮眼，并且大出风头。据统计，雷奋在院会期间共发言146次，易宗夔发言则高达419次，而罗杰也有138次，相比大多数钦选议员几乎空白的发言记录，民选议员的表现

无疑令人刮目相看。

在资政院的短暂议政史里，影响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应以弹劾军机一案为首。因为在传统的政治权力架构里，皇权及其衍生出来的权力机关，其权威毋庸置疑，虽在皇权及士大夫官僚之间存在权力分配与相互制约的历史现实，但就整体而言，皇权与相权仍隶属在一个大的垄断体系当中，要想从外部挑战阁揆乃至皇帝的权力，只有农民起义一途，资政院的设立在这种绝对权力的系统里，显然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通道。

从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对于当时立宪派而言，资政院的设立一方面让他们看到了立宪的希望，但他们一方面又无法接受九年的预备期，此时各地督抚也开始附议立宪派的呼声，要求成立内阁国会，缓解中央集权对地方的压力。因此在1909年和1910年，全国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活动，甚至部分满汉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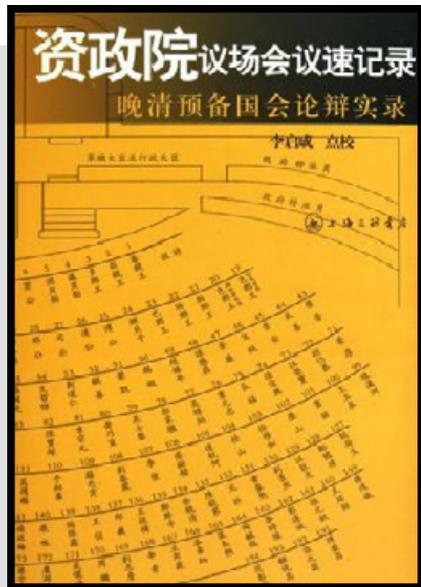
抚也开始联名电奏，要求速开国会，组建“责任内阁”。此时，摄政王载沣的软弱性格再次表现出来，他先试答应提前召开国会，并在这之前组织内阁，但一方面他根本无法妥善处理军机处与资政院之间的矛盾，因为此时资政院的议员们一反往日的温顺与服从，公开挑战军机大臣的权威，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对此十分震惊，“吾辈居中国四十年，一旦得目睹此景象，殊堪惊讶。吾辈今日所见者，与前日所想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土尔基、葡萄牙之两大革命尚不能比。盖今日之有资政院，一若满人权利递交人民，仿佛二十国同时革命而不流一滴血云云。”可见资政院对于当时政治格局，非但未流于附庸，反而有直捣黄龙之效用。

1910年10月3日，北京资政院开院，根据当时议场纪录，“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及议长、副议长、议员、秘书长、秘书官等均向御座行三跪九叩首礼”，以表达对君权的服膺，但不大为人所注意的一个历史细节则是，当摄政王载沣致辞时，议员们并未行跪拜礼，而是站立聆听。这无疑透出资政院与摄政王不再是等级分明的上下隶属权力关系，而是平起平坐共谋国事。

之后，资政院的常年会讨论中，首先关注的就是其目标以及与内阁军机之间的权责关系，力图厘清资政院的职责与权力，这显然与清廷的初衷有所差异。比如在第七号议场纪录中，民选议员易宗夔就不满议场大谈细枝末节之事，与大局无涉，“现在我们资政院开院已有半月，政

府交议之案及核议各省之案，均是枝叶上之问题，不是根本上的问题。至于根本上的问题，就是速开国会。当此存亡危急之秋，惟国会可以救亡。”

此番言论，虽是易宗夔一人所为，无疑代表了诸多民选议员的真实愿望，从身份上来看，钦选议员出身宗室官僚，基本无留洋背景，而民选议员中，留日者众多，且大多出身日本法政大学，如议员孟昭常，晚清著名法学家，其兄是大名鼎鼎的史学家孟森，昭常就是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而深得现代政治精髓，并且早在光绪年间就曾编撰《公民读本》，在公众中传播现代政治观念。有此背景，民选议员自然不会安于内阁军机的议案，而是试图推进政治的转型，孟昭常就曾在议场有这样一段发言，“大家说现在世界各国没有不负



李启成 点校：
《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
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
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4月

责任的政府，若政府不负责任，就是没有政府，没有政府就是没有国家。我人民不幸而生长在无政府之国，恐不久而为无国家之人。”如此简单明确的“责任政府”观念，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皇权官僚体系下自上而下的权力安排习惯，认为民众（尽管是间接代表）有权力监督政府的责任履行，这无疑透出资政院弹劾军机的观念端倪。

弹劾军机一事，源于湖南巡抚不经省咨议局的统一而签发公债，资政院以投票形式支持咨议局的反对意见，但摄政王一方面责备巡抚杨文鼎，一方面却仍要通过此项公债协议，这使得资政院诸位议员大为不满，甚至提出要军机处大臣

来院问责。此后云南与广西也都发生类似地方大员与咨议局之间的矛盾，尽管资政院仍支持地方咨议局，但朝廷却根本无视资政院的请求，这最终导致资政院发动了近代宪政史上破天荒的内阁弹劾事件。

11月22日，因为对谕旨中将资政院的议案交付行政部门审查不满，易宗夔率先发炮，认为这与立宪政体的三权分立违背，要求弹劾军机，得到议员的鼓掌响应，紧接着民选议员陶镛、陶峻、罗杰相继发言，直斥内阁军机不负责任，激进之语甚多，“本院议事现在毫无效力，我们议员还是要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事？军机大臣把资政院推倒之后，试问军机大臣能否把中国闹到不亡？试问中国亡了，



图为皇族内阁成员

军机大臣身家何在？富贵何在？”如此种种激烈话语，充斥在当日的议场中。抛却言辞的不满情绪，议员的核心要求其实在于军机处应对皇上与议会负责，建立起现代的内阁责任制度，资政院这样才能实现立法与监督的作用，否则根本无法挽救国事的危急。

不过一到弹劾军机处的议题，资政院内即开始剧烈分化，民选议员与钦选议员的立场显然有别，议员陶峻就说：“议院责任在于维持国家的安宁，军机大臣不负责任，置国家安宁于不问，我们百姓就危险的很，所以民选议员要弹劾他。但如果国家亡了的时候，试问钦选议员还能坐在这个地方吗？”对于民选议员而言，尽管他们深知国家与人民的直接关联，但他们也试图让钦选议员们认识到，亡国对于他们的利益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不能以袒护的心态去看待弹劾军机的议案，而是要督促内阁责任制的形成。

不过，弹劾一事虽让议员们群情激奋，但权柄毕竟操控于摄政王为首的宗室内阁手中，最终也只是落到“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境地。但从资政院的前后表现来看，无论钦选、民选，其实对于立宪、内阁，均无大的异议，政府应要负责

等等现代政治观念，也算不得什么石破天惊的想法，如有分歧，也只是或激进、或渐进的些许差别。到了宣统年间，立宪已不再是观念上的传播，而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局面。而且以当时资政院的议政记录来看，议员们的发言、辩论、议事，其公开程度、对议事规则的把握，专业的水准，都可称为一时之美，远非今人所能想象。

1911年5月，摄政王载沣宣布推出新的责任内阁，基本维持了旧体制的人选，尽管内阁中有多达五位王公成员，被誉为“皇族内阁”，但立宪派显然更在意的是担任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这意味着原本可以缓冲皇室与立宪派之间矛盾的责任内阁，反而成为君权的延伸。不久，资政院联合会就发表声明，认为新的责任内阁实质上仍然是军机处，“名义上是宪政体制，实质上还是君主政体”，要求皇室宗亲不能入阁，但是载沣在政治上的“短视”使得他一如既往地拒绝了资政院的要求，认为这是朝廷权力，不容改变。

如此一拖，辛亥革命接踵而来，当年资政院寻求立宪的种种努力，也从此进入历史的故纸堆中，以致今日读来，仍让人唏嘘不已。❶

分享的潮汐

——微博的话语权革命



特约撰稿人 吴强（北京，qiangwu.de@gmail.com）

到今年底，新浪微博的用户群将达到3亿。问世仅仅两年，微博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互联网的面貌，也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只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有少部分人，特别是官方媒体、官僚们、以及传统知识分子对微博抱着相当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稍早有央视评论称微博是谣言机器，大讲所谓网络诚信；近又有少数公知接连宣布退出微博，并在煽动性报纸上撰文指责微博言论充满民粹主义和语言暴力。如此种种，风雨欲来，坊间遍传测试版的微博终将难逃关张命运。在门户网站、监管部门、甚至最高当局眼中，微博言论的某种颠覆性、不确定性似乎正在对当下维稳政治的最大挑战。

如何看待批评家们对微博的拒斥，如何判断这种官家眼中的政治挑战或者不确定呢？与原型网站推特相比，推特网站处在被严密封锁的境外，推特的中国用户也只有区区20余万，无论推特汇聚

了多么富有自由主义和民主精神的讨论，都容易被看成是一小撮；但是微博却有着最为广范的群众基础，这一基于推特(Twitter)克隆而生的中国社交性媒体问世两年就拥有3亿用户，如果加上网易、搜狐、腾讯等平台的微博，总用户接近5亿并将继续增加。其中，虽然有娱乐明星主打，虽然许多普通博友以风花雪月故事、时尚与生活琐碎为乐，乍一看上微博和现实空间并无多大差异，似乎“去政治化”仍然是主旋律；但是，只要深入下去就不难发现，微博言论已经形成了一种有微博特色的“政治正确”：任何与社会公平相悖、压制自由与民主、为威权政权做辩护、哪怕是提倡改良主义的言论，都极易引发众怒，招来海量的批评，甚至决斗的邀约。与这些“政治不正确”相对的，微博的主导言论集中在草根性诉求而非利益集团的同情者、更多的表达对腐败等政治社会问题不满的而非唱红歌表

忠心、倾向于平民民主的而非精英民主、主张激进的、抗争性的全盘改革而非渐进式的改良主义。

这些带有进步运动、草根民主、和激进主义色彩的政治正确主张在微博上有着“多数”的认同，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新的公共舆论“主导权”，不仅超越传统媒体、互联网1.0的BBS论坛，以致关天、猫眼、校园网等BBS的流量日低，媒体界的朋友们每天主要工作就是从微博上寻找新闻线索；而且让许多过去十年曾经在纸媒、电视和BBS上成长起来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受不了，轻则如秋风，不久前终于在经过了“痛苦的思考后”宣布退出微博，重则一些人转向指责微博充满民粹主义的仇恨情绪，当然一些官方媒体更是抓住微博上的所谓谣言，大谈网络的“文明”、“净化”云云，网名“健崔”的影评人闫某还因微博约架的言论被破天荒地治安拘留五天。

这种微博多数-舆论主导权的出现可能是空前的、革命性的，完全基于Web2.0或者微博的社交性媒体特质本身，也就是说，如同推特革命所指代的内在的媒体介质所具有的革命性，似乎颠覆了以往的“媒体中性”认识，一个新媒体是否可能因为内在的革命力量改变世界？笔者所知，若离开传播界，即使在政治学界，主流看法仍然相当保留。笔者曾经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问过与会的中年学者们，大部分都没有微博帐户，少数几个开通的还只是“潜水”，大概他们能观察到的也多是不怎么发言的熟人朋友吧。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
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
何道宽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但是，微博所具有的革命性也非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次，上一次发生在启蒙时代的机印书本，归功于古登堡活字印刷机的发明。1450年德国莱茵河畔迈茵茨，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机试验成功，然后开始了一个革命的年代：在无数印刷所赶印马丁·路德翻译的德语版圣经和1517年的《95条论纲》的过程中，印刷资本主义加上新教福音的传播开启了一个真正的启蒙时代，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现代性的基础。这是本迪·安德森的名著《想象共同体》中对机印书本所具有的革命意义的描述，机印书本所形成并固化的新语言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官方语言。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理论建立在传播史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研究基础上，而

机印书本的革命性意义在后世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包括在库恩、韦伯那里都被淡化了。

爱森斯坦发现，相对中世纪的手抄本，15世纪以来机印本的标准化的反而产生了书写的个性化以及对这种个人主义创作的肯定制度——专利和版权制度，极大促进了知识的创造，也就是印刷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书籍所提供的横向反复阅读模式在思想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潜移默化的紧密联系，“产生了一种接受思想力量的新型的公众”，使得书本中的思想能够在遥远的地方发生影响。比如被称作“书本宗教”的新教革命，后来英、法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在欧洲、中亚和亚洲其他地方的传播并形成的大众民族主义革命浪潮，以及更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在有着尊孔传统的中国，现

代史也多次重复着书本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再到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各种书籍一次次成为意识形态动员和颠覆的主角和载体，也由此反复强化着统治阶级和中国知识分子对“书本-思想”作为斗争主阵地的共识，也或多或少地造成当新革命的互联网传播到来之时，反革命的保守力量空前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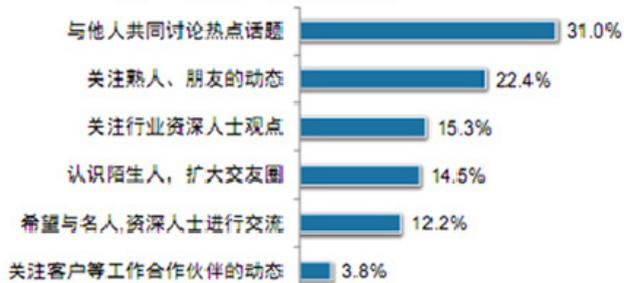
比较书本革命，虽然对原型推特的研究结论不能简单地套用在微博上，微博的政治潜力也非简单地基于用户规模的庞大，而具备显而易见的政治多数的潜在意义，而是因为微博拥有推特相似的、强大的内在的、社会性的革命力量。这种Web2.0社交性媒体所具有的革命性已经在阿拉伯之春中得到充分显现，却跟书本曾经具有的革命性也尚未得到充分认识。

比如，推特和微博这种简单而利于互动加深并且促进群聚网络效应的界面，根本颠覆了传统书籍的阅读方式和影响：用户不再个人化地反复阅读某个具体作者的长篇大论，或者依靠个人对印刷本的圣经的阅读和感悟而因信称义，而是期待着Timeline的每一次刷新都增加的十几、上百条微博，然后在从上到下的快速扫描中发现并分享新鲜观点、评论、新闻和任何有趣的文字。每帖140字的限制固然无法容纳精深的思想、进行冗长的对话，但却以一种碎片化、个人化、连续化的信息、思想与知识的随机组合使得每一位微博用户最大限度地可能与其他人分享，并留下更多的自我空间。分享的碎片

微博用户主要关注的人群



用户主要关注的微博内容



来自万瑞数据《微博媒体特性及用户使用状况研究报告》

可能来自娱乐时尚，或者观点争论，或者是几千公里外或者身边城市所发生的某个事件，还有超文本链接的文章、书本和音视频。在此手指不断“切屏”、快速刷新的集体阅读过程中，书籍时代的版权或者思想究竟属于谁相形之下显得无足轻重，原创作者或者爆料深喉只能标记时间线上的涨落，分享主义的碎片化的公共阅读才是第一位的。

而分享有赖于每个终端用户与极大网络背景之间的某种有效联系。当终端用户发出一条条意见、消息，期待得到一个有着大致相同认同的意见网络的肯定，还有来自网络的不确定的反馈意见和新消息，最终整个社会背景和网络的不确定性产生的新鲜感产生巨大的粘性，吸引每一个终端用户不断刷新屏幕和维持网络化交往。这样一种无数个人对认同和背景变化的期待不啻为一种集体的行动，结合了对社会现实的确定性批判和对社会变化的不确定期待，仿佛等待着召唤的密码，随时可能转化为真实的集体行动。于是，在数亿微博用户每隔几分钟的“切屏”和期待之间，阅读从此不再是启蒙时代以来的私事，不再是书籍时代读者对作者的崇拜，也不是出版商们的生意，或者与上帝沟通的媒介，而是一种在个人-集体间通过背景刷新过程反复确立的正反馈而形成的认同运动，由此带来超大范围内的分享意义上的集体快感，如潮水般自我替代、涨落。

结果，几乎每一次微小的争论、每一次插曲性社会事件，都能形成对每一个持

着这种变化预期的用户的“微博切屏”表达行为的正反馈，然后扩展、巩固基于言论认同的网络簇集，也是对整个微博用户群体也就是越来越庞大的中国网络公民群体的正反馈。另一方面，任何的负反馈都可能激发、强化个人和集体的不满，并且促进进一步的参与表达，过去两年间无数次所谓微博事件，从江西宜黄案到艾未未借款，已经反复证实和强化了这一微博言论行动的“极化”机制，包括付诸集体抗争的行动、甚至博友向五毛党人的约架。例如，官方的介入，包括政务微博和“五毛”微博、平媒社论以及实际威慑行动，都事实上加速这一极化，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帮助艾未未的话题不断更新、深化，最终，每一位从自己的微博Timeline响应发帖和跟贴再加上支付宝的网上转账就立即见证了一次空前规模的网络借款行动、过去20年仅见的一种集体抗争。类似的，每一位参与突发事件讨论的微博用户也似乎都能从事件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呼吁与网络响应直至结果的正反馈。

所以，微博的言论效应不再是上一代“书本宗教”或者“书本革命”依靠的所谓思想的力量，而是极大规模的网络用户群在极大的网络背景下的意见潮汐上进行集体冲浪的“新多数政治”。首先，在互联网特别是Web2.0的网络化作用下，潜在极大规模的微博用户相互链接然后聚集形成意见“人浪”。人浪中有着各色社会运动或抗争运动的支持、网络知识分子的鼓噪、“刷屏手”似的话痨主义和

民主和自由理想的共存，而绝不同于前政治时代的所谓暴民的民粹主义，也比不防火墙外更为极化的“推特异议群”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更不同于苹果的每一款新机型所带来的邪教般的群体响应。他们超越了各种阶级、阶层、地域和族群，渴望着各种新的社会变化，最终将接近“99%”的大多数，代表着成长中的真实社会本身。

其次，每一条微博的表达诉求及其反馈性聚集，不仅有意见性表达，也有基于互联网的超文本链接方式所带来的海量知识整合和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各种变化动态，活跃的微博用户的Timeline上不仅能看到绝大部分热点争论和事件，也能涌现当下国际热点的动态。一方面，由极深的网络背景和分享主义的知识生产产生各种开源运动、自由下载运动如海盗湾、和匿名冲浪权利运动等；另一方面，超越国界的冲突与变化的不断发生，即背景刷新，已经代替了电视、纸媒这些传统媒体的内容提供者，似乎只是为了充满Web2.0时代推特、脸书、微博用户们的时间线，在几乎每位深度微博用户的时间线上都能看到这样的潮汐涨落。也就是说，相对机印书本应运而生的垄断知识的中世纪蒙昧状态，微博的知识背景也是特定的历史性的，基于全球化时代重新孕育的两极化冲突所制造的地方性潮汐甚至革命性的海啸，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公平、民主阵营与威权俱乐部、阿拉伯

茉莉花革命内外的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直至太平洋主导权争夺的新冷战等等冲突，可能不过是为了充满Web2.0时代的推特、脸书、微博上的终端时间线，一种新的普世主义的传播和运动。

微博的知识生产过程也不再是机印书本时代作者和读者的历时性的远距离关系，而是有着高度在场性的共时性网络聚集的政治实践。其中汇聚如涌浪式的参与、相互评论、转发千次、万次之后，深喉本身因为太多而被遗忘，评论再绝妙、作者再著名或无名也被忽略，大多数微博用户的时间线上只剩下可分享的、被分享的共识性意见、知识和真相，不仅让威权者保守僵硬的陈词滥调黯然失色，也让许多传统知识分子甚至过去十年间在Web1.0时代成长起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应接不暇，几乎接二连三被一波接一波的共识性“涌浪”拍死在沙滩上。因此，从争议言论到热点事件，这种新多数的政治实践，而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体现为微博媒体作为一个全新的话语空间的话语权，第一次赋予了中国新兴公民社会的某种“新多数优势感”的抗争主导权，对任何现实中威权或试图反对这种共时性、网络性、聚集性的微博结构的政治体制，发动每一秒钟、每一条微博、每一个终端都在不断刷新的革命，然后以连续浪潮的方式汇成中国今天的互联网舆论，主导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抗争事件/行动的进程。最终，未来可期的社会革命必然以微博海啸的到来为标志，这就是微博的话语权革命。○

音乐杂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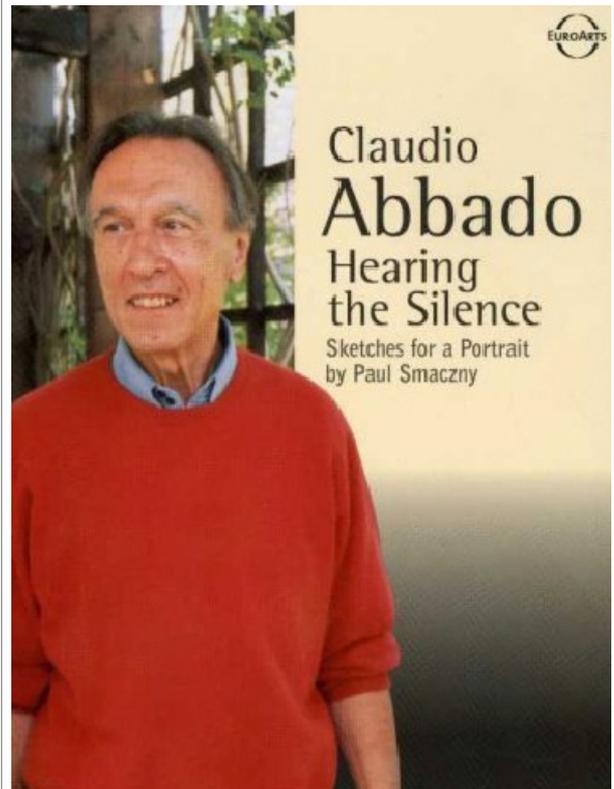
特约撰稿人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huiyuanma@gmail.com）

一

我弹琴给老师听，他要求我在两个音之间做出一点间隙，但就那么一点点，小得不能再小，要求几乎听不出来，但自己能感知。为什么要这么小？因为上下文中有大一点点的间隙，也就是更长的句子，有如句号，但仍属短句。有短句的句号在前，短句的逗号只好更微妙一点，直到几乎听不见。

我知道这类要求在管风琴演奏（甚至其他乐器中）并不少见。另一类似乎效果并不明显，但不少演奏者乐于去实践的东西，就是早期指法。

说起来，音乐是给人听的，听不出区别的事情，做它干什么？但我后来想了想，发现其中是有一些奥妙的，因为演奏者是第一个觉察音乐的人，他不仅是“施者”，更是“受者”；演奏是由动作完成的，而动作的趋势、模式、运动的习惯，是演奏者给自己制造的气场——我为之发明了一个词，“动作流”——它是演奏成型的关键，不仅是肌肉记忆，指点你随时找到正确的音符，而且给自己成就了心理定势，一种愿望、想像和气场。具体到演奏，在某些琴上



听不出区别，并不等于在所有琴上都听不出。有些机械运动的琴，是能够敏感地反映间隙的。不管怎样，既然谱面有一定的暗示，演奏者有责任尽力将其吞咽、“内化”，形成习惯，直到它化为直觉，哪怕几乎无人觉察。听众不会觉察某个短句的逗号，但或可为总体的舒适而满意。

在《追寻早期音乐》的一篇对莱恩哈特的访谈中，莱恩哈特说到二战后羽

管键琴演奏的变化，他表示这是很难讲清甚至无法直接演示的，为什么呢？他说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人们对音乐的想像和期待的变化，这其中有历史和社会风潮的影响。比如一战之后的一段时期，羽管键琴的复兴刚刚开始，人们打算的是要将之和钢琴区分开，要和浪漫派划清界限，所以有意躲避钢琴中的一切方法，连分句都开始抹杀，比如瓦尔哈就是一个典型——对此笔者“实在无法更加同意”了。瓦尔哈那种极度死板、不呼吸的演奏，实在无法令人产生快感，幸好人们对早期音乐的探索未止于此，而是不断拨乱反正。

今人的早期音乐演奏，至少要做到生动，符合基本的音乐要求。所以，这背后确实有一定的心理因素——笔者粗糙地猜测，瓦尔哈们反的是钢琴，后人反的是瓦尔哈，从而不断调整、取中——这个过程背后当然有着许多论文的讨论——这个看似小众的分支，留下的著作却极多。总之，诠释音乐理念的变化，终于带来成果的变化，虽然你很难讲，到底是哪类细节在改变。尽管心理体验因个体而异，但考虑到古典音乐演奏中的严格师承，它终究属于集体记忆，和一定范围内的时代相关。也正因为历史谜案多多，出发点与既成事实之间的矛盾多多，我读类似的资料，总会意识到，每句话背后都有着激烈的争论，每个名家都处于批评之下。

莱恩哈特还说，十七、十八世纪左右

的音乐，是近于“说话”的（相对于十九世纪之后的长音歌唱），所以语法和组织性格外清楚，有重点和非重点音符，在重点音符的带动下，非重点的音符自动流淌而过。

莱恩哈特还有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他认为除了天赋和天性之外，还有一些因素造成演奏者之间的区别，比如年龄。年长的演奏者倾向于忽略细节和分析，把自己交给下意识，顺其自然，而年轻人尚处于有意分析的阶段，故口齿清晰，理论多多。这篇访谈的标题就叫做《不应立法》——One Should Not Make a Rule，也就是说处理音乐不应有一定之规，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要多顺从自发感觉的带领。对此笔者一半赞成一半保留。音乐的自然流动固然是一定阶段的成绩和产物，但如果你想更上一层楼，打碎自己追求新语言新方式呢，难道不又要从细节和分析开始吗？人入老境，可能日益圆熟自然，却也可能沉溺其间，不求变化，因为“总体”、“大体”这些概念，固然可以因人而异，但太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重复。

当然，说到这里有点跑题了。其实读到这里，我的收获是，为什么音乐操作中有一些不那么容易解释、不那么容易产生直接效果的东西，它可能没有直接地影响听众，但影响了演奏者的状态，从而渗透到音乐中。听众无法将它的作用萃取出来，但这也正是音乐的趣味之一。

对了，听众。指挥家阿巴多在纪录片《倾听沉默》中，说到“我认为最好的观众，是那种在某些音乐之后要求寂静的作品（比如马勒第九）之后，能够沉默很久才鼓掌的人。他们能够克制的时间越长，我越是感知到他们的存在。”你看，听众和演奏者之间，一样存在着彼此的暗示——观众的评论和掌声，其实是过于显在的反馈，我这里强调的是下意识的影响。

钢琴家阿姆朗说过，音乐就是听的，不应受任何音乐家信息干扰——无论音乐家现场做激动、感动状还是音乐家伤病缠身、不久人世，这类信息应该一律忽视，音乐就是音乐，一切评判应由此出发。他还在另一个场合说过，现代人的一个问题是，对作曲过程、音乐家传记讨论过多。而这些都是不可信的，只有音乐的结果，演奏家当场做出的效果才算数。

我非常理解他的意思。但常常，我的确会被一些音乐家的信息左右，因为音乐是人造的，你对某个音乐作品（演奏）产生的亲和感，往往也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一点并不容易，也并不应该完全剥离和抹杀——音乐终归是生命之间的对话和通感。更何况，音乐多含历史和文化，乃拖带背景的纵深之物，如将其剖取一个截面，难免损失趣味。而将音乐家当做“人”来吸收到审美体验中，是否令倾听变得过度主观，不够公平？不管怎样，我同时保留两种态度——不拒绝和音乐家之

间的“气场”，也不拒绝无场的纯粹听觉接触。“双重标准”，并不为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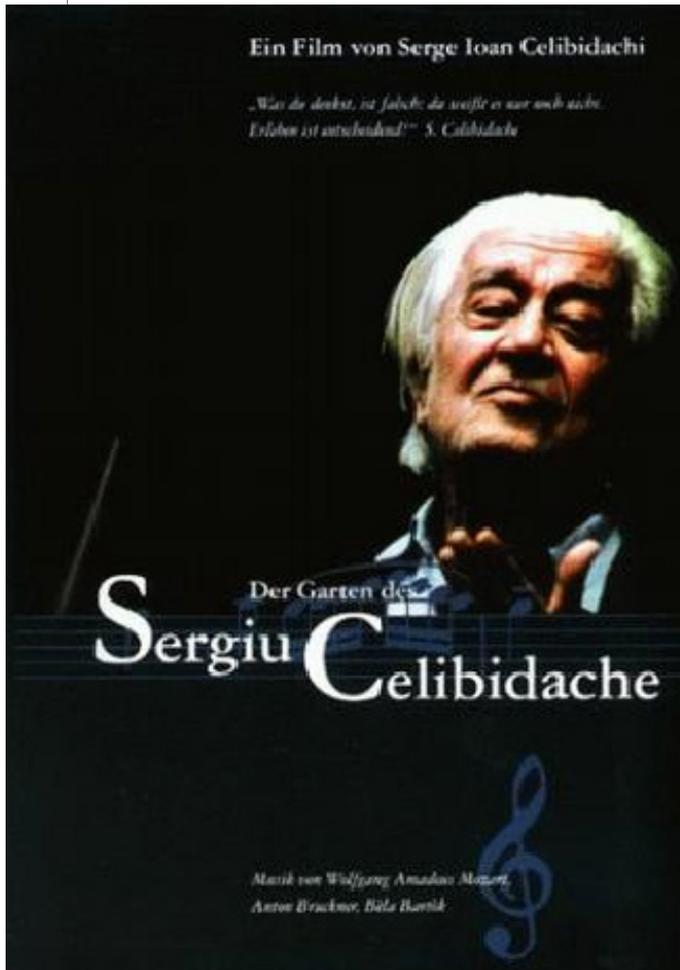
在声音的物理振动之外，音乐还来自运动、身体、情感和想象一瞧，这是我自作主张为音乐贴的标签。我承认这些标签也是极为粗糙，充满歧义的。经验一旦收敛为词语，自然会大大磨损。我把阅读当成一种以想像来勾连文字、生成意象的过程。我相信演奏和倾听也如此，经验和想像令干燥的音符生出晕染、形成纹路，集体和个人记忆交汇其间，寻路、走偏、遗忘、迷失。也许，艺术的历史就这样充满荒谬的误会和激动人心的误读。

二

指挥大师切利比达奇留下一部由儿子导演的电影《切利比达奇的花园》，颇有些意思。

就像那些鲜活、个性强大的艺术天才一样，切利比达奇是不容易介绍、更无法总结的，用他自己的想法来说，“音乐是活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他反对录音，也反对音乐批评。

“越有名的知识分子，说的话越没用。”“音乐是自然发生的，你要把它的命运留给声音的振动本身。”“音乐逃脱所有的定义。所有对音乐的定义都是在故意地‘减少’音乐。所有的数学表达都是减少。所有形式的表达都是在减少。”当有人问他“你为何指挥？”他说，“没



有‘为什么’——我为什么呼吸？因为要活着！我只是做而已。佛教徒认为任何问题都不应该有‘为什么’的问法。”“音乐是一种生命的形式，是有机的进化。不要试图去‘理解’音乐，音乐没什么好‘理解’的。”

在他这里，音乐是“渗透式”的生成，是个整体，你不应从局外控制，而应将之贯注进心灵和生活，让它自然生发，而非以科学或工程的态度，孤立某个元素认真改进。“智性”，“分析”，在他这里都是贬词。

而通向音乐的路途，是感性、自发为高，还是理性做基石和引导更好？这样的争论如此古老，以至于我无法再陈述它，因为它分明涉及了音乐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最容易被误会的方方面面。而从“结果”来看，有些大师力主理性分析，比如巴伦博依姆，还有些大师极善言辞，讲起音乐来穿透人心，如伯恩斯坦。也有些大师并不愿系统立言或者不善文字，对音乐以渗透式积累为本，令音乐甫一出场，就是感人的“整体”——富特文格勒、切利比达奇都属于后者。

可见，大师们的理念和各自的个性捆绑到底，各自通天。

还有个例子：有个关于美国建筑大师赖特（Frank Wright）的纪录片，讲他办了个学校，没有教材和确定教法，而是叫学生直接干活，干建筑的活。当时很多人批评他拿学生当奴隶使，但也有人认为他本人在场和学生打成一片的方式就足够好了，“他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教学”。假设我是学生，从这类接触和认知中来学习，实在要看造化，可能学会也可能一无所得，看个人悟性。但这种方式也是有趣、有益的，它必须存在，和传统的预设并量化好的认知方式形成互补。

我又想起一种最常见而又最复杂的艺术品——生命。你我都是由母亲身体里的种子孕育成的，没有人教，小种子自己知道该吸收什么，然后它就长成一个鲜活、丰富、有许多不可预测之处的生命，而与

此相对的制造方式是按配方来复制。两种事物（生命）的生成方式，也正对应两种认知方式：一是在混乱中大面积接触，不可预知地获得知识和灵感；一是孤立某个方向并不断加强，不浪费任何材料和时间地，在方向指引下成型。前者有可能制造天才，但概率极低，风险极大；后者长处在于批量生成可操作、可控制的成品。也许各种文化、模式下的认知发展，都是两种方式不同比例的混合物。

而我个人相信，所谓感性和理性之途，虽然有所分别，但一定是交替螺旋前进的，没有什么道路能够单取一种。所以，在这里斗胆和切利比达奇的意思唱个反调：我认为音乐批评、音乐史的陈述，也没有那么不堪，并且，对待那些音乐批评以及和音乐相关的种种表达，同样要面对它们背后的生活。关键在于，我们读者该如何面对他人的文字——那些所谓来自知性思索的结论，也许只是“看上去”知性而已，它们的斑斓色彩和充满感情的瞬间，并不容易被读者所想像。

既然音乐是活出来的，和音乐相关的文字，一样可以是活出来的。我反对的是那种从理论到理论、从标签到标签的推导式文字，但无论是音乐史、艺术史或索性是“历史”，无论是音乐批评、艺术批评，还是任何文字，每个词语、术语背后一样有着纵深的的生活，那些鲜活的写作者、批评者，和音乐家一样经历了各自的曲折和了悟。音乐之丰富和文字之丰富，

殊途而殊归，生生不息的个人岁月和集体记忆将之牵引成型。

作为一个巴赫迷，史怀哲的《巴赫传》、学者沃尔夫（Christoph Wolff）的《巴赫读本》等等，都是我的常备之书，而在不同的阶段，我总是会读到不同的东西，有时，和巴赫相关的人物比如帕赫贝尔、布克斯特胡德在我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专家学者们关于这类人物的描述，自会引发背后的比较和联想。而对他人理论的不同领会，对我而言往往意味着一段卑微而真实的时光。没错，表达本身是“减少”，但对表达的阅读和领会却可以是一种增加。

我在这里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格林伯格在《巴赫和巴洛克》讲座中说到，当年巴赫申请莱比锡的托马斯教堂，在候选人中排第四位，第一是泰莱曼，第二第三是我没听说过的名字，也就是，并非传世的音乐家。巴赫在那个时期相当不开心，感到自己工资不够。最后巴赫拿到了托马斯教堂的职位，这个职位的“行为手册”就有好几十页厚，若干条什么不准之外，职责包括每周提供康塔塔——所以这些教堂音乐家们疯狂高产也是被逼出来的。巴赫跟别人的区别就是，他的每个东西都是创造力的结晶。

拿这个管弦乐组曲第三号（BWV1068）来说，基本以法国风格贯穿，序曲是ABA，但巴赫在B中塞进了一个复杂的赋格，这并不是形式所要求的，

而是他自己的毛病，也是典型的巴赫做法：由简到繁，并且将繁的可能最大化。这也是一种才能和心血的高度集中，浓郁地流到所有的作品中。

格林伯格讲述的这两个细节（当然，他的讲座中更多的是结构分析）当时给我的印象，简直如同“引爆”，许许多多的谜团都开始稀释，让我开始发现更多的巴赫音乐，尽管我认为自己对巴赫的种种鸡毛蒜皮，原本还略有了解。历史不论讲了多少遍，往往是别人笔下的，但当某些细节显得太真实，太像你我所经历过的事情的时候，就会突然激发出意想不到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样有趣的瞬间，可能是格林伯格一一读来那些排在巴赫之前的名字的时候，也可能是指向赋格的

分析——语言的指引和放大激发了蓬松的热情，而历史感停留在花骨朵一样的细节上，情景交融。

说到这里，我反而无力和切利比达奇争辩了。事实上，我深深赞美他在深厚积累和渗透之下的“忘言”，以及他所追求的境界：让音乐自然生长而凸现方向，而非强加诠释。他在谈论布鲁克纳的交响曲时说，“慢速度供人感受到其中的丰富，也让人有机会表达其中的丰富。”对，“缓慢”，这才是我最想说的。缓慢的阅读和缓慢的音乐一样，让感性和知性交融，让生命和音乐汇合，因为时间是生命的背景，而种种言说一样是生命的声音，同音乐一起震响。Q

我的巴别塔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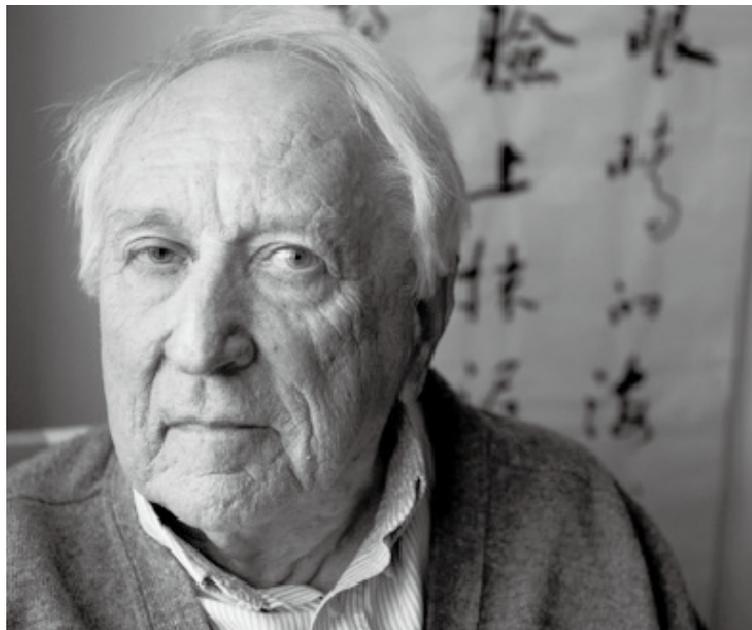
ESSAY

图为诗人Tomas Tranströmer

特约撰稿人 罗四翎（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记得小时看到这两句被当做春联糊在大门外的诗时，心里还会为此波澜起伏下。看了一年又一年之后，再看这对春联，没了任何感觉，甚至连又是一年春来到的感觉都没有。对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也是这种连时间的感觉都没有了的感觉，直到看到有人为此竟然认真地打起口水战来，才有了几分兴奋。11月22日出版的《纽约书评》上，以《我们需要诺贝尔吗？》为题，刊登了一组《纽约书评》作者Tim Parks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Per Wästberg的通信，就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进行了一番辩解与反驳。事情的起因当然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0月6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公布今年获奖者为瑞典诗人Tomas Tranströmer的当天，小说、评论家、翻译家、米兰IULM大学的副教授Tim Parks便在《纽约书评》官方博客中贴出质疑之文《诺贝尔文学奖出了什么问题？》

(What's Wrong With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唯一有些新意地方就是开头三句：“是的，这次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瑞典诗人Tomas Tranströmer。除开在网上可以读到的长诗外，我没有看过Tranströmer的任何东



西。不过，我确信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个不错的决定。”之后，这个Tim从瑞典文学院成立的初衷、如今评委会成员的组成、整个评选活动流程以及他们是否可能阅读这么多的作品对评奖过程进行质疑，最后结论是今年的评选结果之所以不错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可以“提醒我们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糊涂与我们自身将它看得很重的愚蠢。18位（或是16位）瑞典人在评价瑞典文学时，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可是若是面对其他国家各种不同的文学传统中产生的变幻无穷的文学作品时，究竟什么样的团体才能真正把握住其精髓呢？而我们为什么

要他们这样做呢？

与这篇略显粗暴浅薄毫无新意，甚至有贼喊捉贼之嫌的博客相比，博客下面不少读者的跟帖反而更为客观理性，比如不少读过Tranströmer诗歌的人就认为这次Tranströmer的获奖是名至所归，并不像Tim所假想（assumption）的那样是一个默默无闻之辈。一位挪威作家就跟帖说，他就曾将他的诗歌献给自己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也是一位作家。他们两个都喜欢Tranströmer。还有读者指出，诺贝尔文学奖只不过是一个国家的文学奖项，其目的是评选出一位好作家而不是评选出一位最好的作家。虽然有不少人认为Tim说的在理，不过更多的人认为Tim的指责毫无道理，因为要评选出一位合适的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瑞典文学学院的评委们每年要做这么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实在是太为难他们了。“若是评奖很容易，那么写头条就很难了。”（我却卑鄙地揣测，Tim的这个头条说不定早就写好了，只是等着结果出来填写下获奖者的人名而已。）

在这近百条读者跟帖中，其中一个跟帖特别引人注目，这便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Per Wästberg 10月18日的跟帖，在不长的帖子里，这位主席严肃地说道：“我，作为你们杂志几十年的读者，可以给Tim Parks的文章提供一些更为真实的背景材料吗？今年的获奖者Tomas Tranströmer多年来一直被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oseph Brodsky, Seamus Heaney, 和 Derek Walcott

提名。2000年在纽约的时候，Susan Sontag告诉我，Tranströmer是美国最为熟知的瑞典人。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六十种语言。在中国和斯洛文尼亚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咖啡馆。而且在瑞典，从我们年轻时代起，我们都读过他的作品，并且热爱他。”接着，他对于显然不懂评选流程的Tim解释其整个评选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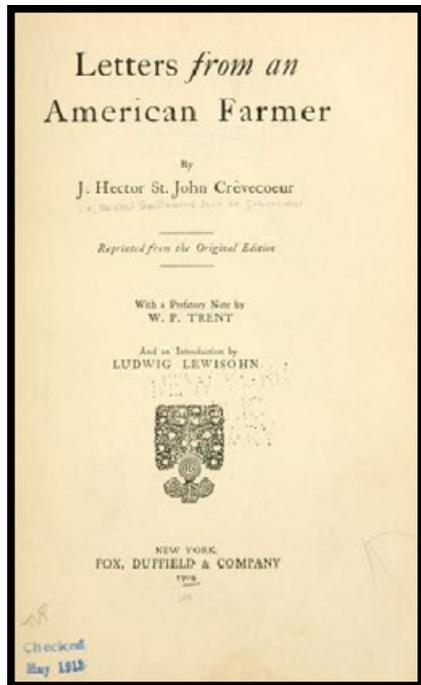
“诺贝尔评委会由瑞典文学院的五名成员组成。2月，我们收到来自全世界的建议220条。4月，我们整理成为一份有20位候选人的‘期待’名单。到5月，我们得到瑞典文学院的批准，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中，只读其中五位的作品。如果一个人没能在这份短名单中呆上两年，他是不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请确信，我们一直在读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作家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作家的作品。”最后，对于他们能力水平的质疑，这位主席自信地说道：“就我个人而言，我尽力一天读一本书，以便远离错误。我们文学院掌握13种语言。不过，当我们怀疑是否有一个天才躲在某种我们不知道的语言中时，我们会要求翻译家或最好的专家给我们提供大量那位作家的作品。”“我们评委会的成员每一个人从孩提时代便是痴迷的读者，有着丰富的知识背景去进行自己的评价。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大学工作的，我们都是自由作家，在阅读期间，都有着自己的东西要写。”

面对Per Wästberg主席礼貌不失威严的澄清，Tim Parks这位生活在意大利的Englishman，或许意识到了自己的轻

率与刻薄，对此只做了不到两百字的“反驳”，说自己写这篇文章目的不是针对评委会或是获奖者 Tomas Tranströmer。而是他惊讶地发现，世界对这个一年一次的例行公事似的奖项给予了过多的关注，这容易让获奖者与其他不可避免地被遮蔽的作家之间出现不可跨越的鸿沟。云云。

这段话在我看来简直是狡辩，与之前文章中的得意相比，就显得有些理亏词穷，有些尴尬了。有一位读者在跟帖中说，这样一篇文章放在《纽约书评》这样一个高品质的杂志上，简直是羞耻。生性刻薄的我深以为是，觉得它最好放到《纽约时报书评》去，以愚乐大众。好在《纽约书评》最后明智地将两人的通信都刊登在纸质刊物上，让读者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费了这么多口舌来说这个，其实只是想感慨下语言不通所带来的隔阂与尴尬。我是非常相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们的品质与公正的。只是语言的隔阂不是翻译就能够解决的，甚至也不是学习掌握某种语言便能解决的。看新闻说，今年5月，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了庆祝成为“世界图书之都”，在市中心圣马汀广场建造了一座由图书构成的“巴别塔”，书塔高25米，呈螺旋状盘旋上升，上面悬挂了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捐赠的3万册书籍。书塔的美好希冀不言而喻。可是在现实中，语言的隔阂而造成的分歧冲突，岂又能这么轻易解决。随着在波士顿呆的时间越长，我越发能体会到这种隔阂。虽然不至于出现电影《巴



别塔》中被铺、被杀、被遣返的惨剧，但却总是让我时不时尴尬一下。在电影《巴别塔》最后，导演伊纳里图打上一段字幕：“献给我的孩子。最暗的夜，最亮的光。”我不知道他所说的“最亮的光”是什么，却渐渐体会到电影里“最暗的夜”。有那么好几次实在空的发狂，便跑去书店或是图书馆想找本书看，结果总是大悲催。因为我发现上了三十年的学堂之后，我竟然又成了文盲。好不容易碰到一次新书中英文同时发布的，于是早早跑去哈佛合作社书店等候，却又大失所望。因为这本书是柴玲的自传。对此，我只能借用王丹的话说，去看网上说的就可以了。

看英文书是彻底放弃了，只能看看报纸杂志。即便如此，我也只能挑选极其有限的来阅读。比如《纽约书评》中的有关中国的文章或是诺贝尔文学奖、占

领华尔街行动等我感兴趣的文章。读来读去，总摆脱不了局外人的感觉。在今年1月13日号的《纽约书评》上，刊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erry Link教授的一篇文章《中国：从饥荒到奥斯陆（China: From Famine to Oslo）》。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来看这篇用了12页word文档装的长文，发现隔阂的不仅仅是语言，还有很多无法言传的陌生东西，这让我开始焦虑。直到有一天，在网上无意中看到凤姐在美国生活的一段视频。一位可以称得上美女的记者一直追着凤姐问，你到纽约了，你是怎么看待你的成功的呢。凤姐回答说，我不成功。跑到美国来算什么成功，把中国变成美国才叫成功。显然，凤姐是在鸡同鸭讲。这位美女依然不依不饶追问凤姐在纽约的成功生活。凤姐说，我做餐馆做指甲可以吧。我没有朋友。我一个朋友都没有。我从来都没有朋友。最后，美女依然不甘心，于是凤姐几乎是在吼，我不成功。我都26岁了，过完年就27岁了。一个女人三十岁都没嫁出去，叫什么成功。最后结果是，我看到的这段视频名字叫《凤姐：我的成功不可复制》，大悲催。短短几分钟的视频中，凤姐没有露面，始终只有一个急冲冲想摆脱美女记者的背影，以及悲愤与近乎绝望的声音。原来即便是操同一种语言说着同一件事情时，隔阂也是避免不了的。巴别塔的悲剧根源不是语言而是语言背后的思维。这让我想起很久以前学习古文时，对“夔一足”的解释。从神话角度解释这三个字的意思是“夔（上古一种神性动物）只有

一个脚”，不过到了“不语乱离怪神”的孔子里，这句话被改造成“有夔一个就足够了。”孔子的解释和思维持续了好几千年，直到近代中国人发现原来还有神话这个东西。

可见人生隔阂不分古今与东西，于是释然，继续享受我的文盲生活，将这几个月来逛书店盲人摸象似的买的书全部搬了出来，竟然也有十几本，全部摊开放在桌上，翻来翻去看了两天之后，基本分类如下：

最早买的一本字典一本诗集一本文学学术书一本畅销小说两本儿童故事以及一本介绍新英格兰作家及创作的书基本属于脑子进水；麻省历史、剑桥图片史、新英格兰历史、波士顿华人历史等几本图文集，虽然图片非常多且好得呱呱叫，但暗自揣摩内容大致属于扫盲水准；基督教会简史、基督思想史、教会和牧师的使命、耶稣与历史、马汀路德传等几本是我所在的教会图书馆清理图书时一刀两本买的，一半出于捡便宜的心态，一半出于好奇与敬畏。这几本书都上了年纪，比如那本Chevalier Bunsend 的马汀路德传（Life Of Martin Luther）是1870年出版的一本口袋书，有140岁了。这让我尤其尊敬这几本书。如此盘点之后，于是只有四本书还让我依然保持着当时为它们掏腰包时的兴奋与新鲜：

《上帝拯救麻省：麻省选举史（God Save The Commonwealth: An Electoral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这是英国kent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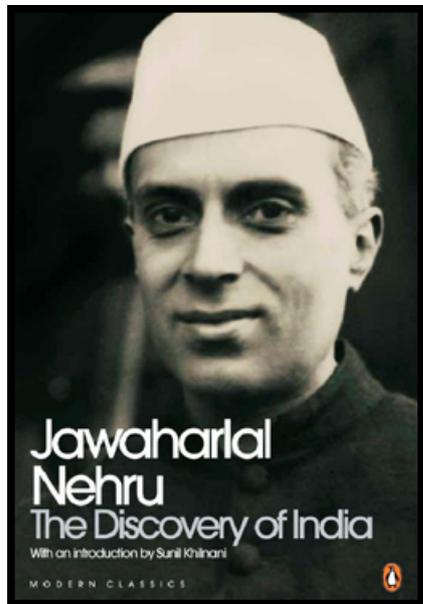
学高级讲师、政治与政府学博士Alec Barbrook 1973年由美国麻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通过考察麻省的选举历史和选举力量来分析麻省的政治制度。在作者看来,尽管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但作为一种政治制度,麻省变得更为负责有效。其中有一章专门分析肯尼迪家族与美国国家的关系及其国际影响。明知道自己可能根本无法看懂这本学术书,或许还是一本不怎么样的书,但我还是很好奇上帝是如何拯救麻省(“God Save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的,我想这句话绝不会是法庭上的一句例行陈词那么简单。

J. Hector St. John Crevecoeur 的《一位美国农夫的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是一本更老的书。作者当然不可能真的是农民,其本名比笔名还复杂:叫米歇尔·纪尧姆·让·德·克雷夫科尔(Michel Guillaume Jean de Crevecoeur, 1735-1813年),出生于法国的诺曼底,1754年移居加拿大,1755年以一位官员制图师的身份来到美国,并娶了一位美国女子,成为纽约的一名农夫。1782年左右,他写下这12封书简,描述了一位殖民地农夫的生活与观点。这几乎是最早的美国文学或是说新英格兰文学的典型:以书信的方式介绍新世界的生活与情况。比如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位作家的Captain John Smith的第一本著作,其实是写给伦敦佛吉尼亚公司的一封信。当时作为殖民地领导人之一Smith

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驳斥当时英国对殖民地抱怨,向英国方面介绍新大陆的优点,以捍卫自己处理殖民地事务的权力。他的这封信于1608年出版,取了一个长得要命的题目,我就懒得翻译了,照录于此:A True Relation of Such Occurrences and Accidents of Note as Hath Happened in Virginia Since the First Planting of That Colony.与最早期的这些内容多浪漫与夸张形式却像工作汇报的书信相比,100多年后,写于独立战争期间的克雷夫科尔的书信显然更为理性成熟,也更具文学性。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第三封信《何为美国人(what is a American)》,美国大熔炉的说法便源于此。但实际上,我却认为这句过于流行的说法将这封信的内容粗暴地简单化了。若是让我跳出keywords,我会选其中这么一句:“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若有共产主义社会有可能实现的话,我会想象成克雷夫科尔描述的样子。如果说,在Captain John Smith的书简中,还是流露出殖民者的心态;在克雷夫科尔这里,则洋溢着一种积极乐观的主人翁精神,借用我们的话说,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克雷夫科尔的这些书简1912年首次在伦敦由Everyman's Library出版,我手上这本再版于1962年,在哈佛书店楼下的二手书店看到这本书时,旁边还有一个更新一点的版本。

对于西藏和印度,我总是心存向往,希望有机会能在那里生活一段

时间，因此，看到Elizabeth Cody Kimmel的《狮子王座上的男孩：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童年》(Boy on The Lion Throne: The Childhood of The 14th Dalai Lama) (Roaring Brook Press, 2009年3月)和Jawaharlal Nehru的《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我毫不犹豫买了。前一本书作者是美国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女，写过不少儿童书，文字简单流畅。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序言中说不妨把这本书当作西藏野史，不过除此之外，我更当作英语学习读物。后一本书则是一本老书。据说要了解印度，有一本书非读不可，这便是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944年4月到9月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狱中所写的，被称为印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书《印度的发现》。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尼赫鲁说，他在狱中对印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了思考，并与11位知识渊博的狱友进行了交流讨论，用了5个月时间完成的。据说这本书1946年首次出版后，有许多人在它影响下投身到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中。1980年再版时，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在序言中说：“我父亲的三本书，《世界历史一瞥》、《自传》和《印度的发现》，是我终生的



伴侣，须臾不可分离。”她认为，这三本书，尤其是《印度的发现》“塑造”了印度整整一代人。中国其实早在1956年便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过，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我总有一个错觉，觉得那会的那么多好书到如今反而销声匿迹，总让人不得不怀疑今不如昔，暂且买上一本英文原版，也聊以慰藉自己对印度的向往之前，以及遮掩我的巴别塔式的尴尬。我想，即便英语不是问题，我也不可能从这本书上了解到真正的印度。因为真正的巴别塔不在书中，而在心里。可是，又转念一想，我并不能以此为理由不学英语不看书呀。于是，看着那一摞英语书，满脑门的尴尬。📖

转型年代的文化生活

“独立阅读”书系新书发布 暨主题沙龙

时间： 2011年11月27日下午3:00

主持人： 苏小和

嘉宾： 王晓渔：《重返公共阅读》作者
凌越：《寂寞者的观察》作者
刘柠：《前卫之痒》作者
成庆：《意义的疆场》作者

2011年11月27日，“独立阅读”书系新书发布暨主题沙龙在单向街书店举行。四位作者为我们打开四个精彩的世界——王晓渔致力公共阅读，凌越重释文学经典，刘柠检讨前卫艺术，成庆绘制思想地图。四本图书由刘运来先生操刀装帧设计。当天下午，独立阅读同仁一起见证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漫谈转型年代的文化生活。以下为文字记录。

苏小和：

大家下午好！在座很多人可能都是《独立阅读》PDF文件的下载者，首先我要深深地感谢5年以来大家对《独立阅读》的支持，大家知道我们是非常民间的、私人的阅读文本，纯粹是好玩，我们也没有很大的志向，没有宏大的叙事，都是一些私人的阅读生活或者私人精神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对这么一份非常边缘性的、小众的电子杂志抱以深深的关注，所以我要谢谢大家！

“独立阅读书系”是《独立阅读》的副产品，事实上，我们四个人的书与《独立阅读》有一点点交叉，但是不太一样。今天特别高兴，请到了四位作者，第一位是王晓渔，大



家都很熟悉了，从上海过来的，同济大学的老师。第二位是成庆，也是从上海特意为了这次活动过来的。第三位是刘柠，跟我一样

是一个无业游民，或者叫独立作家，没有单位的。最后一位是凌越，《时代周报》的，广州过来的，非常非常雅致的读书人，也是一个很好的诗人。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他们几位过来，我就不多说了。大概的程序是这样的，首先由他们每个人讲十到十五分钟，主要讲讲他们自己这些年的阅读生活，尤其是这些

年在所谓转型时代，或者说在所谓的宏大叙事非常非常紧张，非常非常强势的时代，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怎么构建阅读的风景，主要讲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些生活，涉及到一些书目，涉及到一些个人爱好，我相信这样的分享，应该比那些正而八经的观念传播更有意思，首先有请王晓渔。

王晓渔： 迄今为止我大概是一个居民，不是公民

王晓渔：

很高兴今天来到单向街。“独立阅读”这个词非常常见，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常遇到这个词，我发现最常使用这个词的是年轻的母亲，他们经常说自己的孩子六岁了，开始独立阅读了。后来我终于明白，爸爸妈妈不用给孩子念文字，就是他们所谓的独立阅读，按照这个标准，独立阅读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另外一个意义上，我觉得独立阅读很困难。这跟每个人经历有关，我进了大学之后非常吃惊的发现，原来我在中学的时候那不叫读书，那叫学习，现在我非常严格的把读书和学习区别开来，学习就是要考试，找一个标准答案，我们再猜想怎么来符合这个答案。中国的中小学教育都是学习，我们要想独立阅读会遇到很大压力，不要说独立阅读了，我在中学的时候读一点课外辅导材料都会遇到很大压力，认为跟高考完全没有关系。进了大学之后慢慢开始读书，所



谓独立阅读，跟独立思考是有关联的，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想一些问题，而且不是寻求标准答案，而是让这个问题永远存在，很多问题我现在大脑中间还没有解决，但是我觉得很有趣，脑中有这些疑问存在。

为什么我们提出独立阅读的观念？很

大程度上跟自己的阅读观念有关，我们中学时代所理解的经典，读大学的时候发现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发现是那么可怕，跟经典毫无关系。过去在中小学，大家觉得臧克家或者某某人是很重要的作家了，进入大学以后才发现他的作品完全没有太大的价值。怎么评价他们呢？有的人死了，他还是死了。

后来开始慢慢的阅读，尤其是进了大学之后，慢慢开始动自己的脑子。但是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精神资源，通过阅读一些东西，开始慢慢有自己的想法，觉得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不再是被动接受。我一向是不太愿意学习的，特别讨厌上课的，上课就开始睡觉，下课铃响之前三秒醒了，然后就回去了。但是我觉得阅读是无限快乐，目前为止我实在无法寻找到比阅读更快乐的事情，与它差不多快乐的有很多事情，但是比它更快乐的很难找到。

我这本书《重返公共阅读》，什么叫公共，我愿意用网易的说法，公民阅读。首先我们是一个公民。我们在大学里面遇到很多学者，遇到很多博士、硕士，在一起聊天吃惊的发现，似乎是精英人群，按说应该归属于精英人群，但是他对一个公民基本的常识和知识又是一无所知的，可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已经是专家，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纳税人的基本知识，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知识，或者对是否有可能作为一个选民的基本知识一无所知，甚至是仇视和敌视的，这种情况让我很惊讶。作为一个

人的本质来说，首先不是要我成为某一个专业人员，首先是要成为一个公民，这一点本来应该作为一个最低的标准，但是在今天几乎成为最高标准，到今天为止我不是一个公民？我觉得不是。我大概是一个居民，不是公民。心向往之，但是要达到这个标准很困难，在努力中。

公民阅读跟我们所说的专业阅读有很多区别，我们看报纸，报纸上有书评版，寒假、暑假到了，找一些学者给中小學生推荐一些书，给一些公众推荐一些书，发现很多学者专业的界限和公共的界限相对来说比较混乱。因为我有一次看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给中学生推荐一本书，因为他自己做古典文学研究，他推荐某一个古代文人的年谱。至少我个人觉得，这本年谱不要说对于中小學生，对于我们都毫无意义，价值都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对于相关专业研究的人来说，或许价值是无限的，但是作为公众没有必要读某一个人的年谱，那位学者混淆了公共和专业的界限。

我对自己写的书是很失望的，我看自己的书看得万念俱灰，毫无意义，如果这个书还有一点意义的话，它推荐的书是很有价值的，对我所推荐的书，我充分相信它的质量。我本身写的，跟它们相比是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通过推荐这些书，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共同分享精神资源，因为每个人在成长道路上都会遇到一些书，这些书会让我们在瞬间有震惊式的喜悦。我们经常见到一些朋

友推荐的书，大家觉得特别好，比如说最近有更多公众知道的《燃灯者》这些书，我们自己看到好的第一个反应，非常想分享，跟朋友分享，以什么样的方式分享呢？后面就想到写一些相应的推荐，书评式的，我们共同分享一个好书，以此作为精神交流，这是主要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一直认为阅读是非常幸福的，但其实我是特别痛恨写作的，虽然写过不少东西，每次写之前我非常头疼，而且非常畏惧，如果能拖延的话，我是一定无限度拖延的。一篇文章，别人向我约稿，如果没有截止日期的话，相当于无限期，我很难愿意动笔写这个东西。但通过写作可以与大

家分享阅读的经验，这本身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关于阅读我先讲这些。

苏小和：

谢谢晓渔，晓渔的专业是历史学博士，但是他阅读的领域据我的了解非常广，经常在有些场合号称我跟他之间有一个共同爱好，读经济学。晓渔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常常开玩笑，事实上也是真的把他当成我的导师，因为我第一次写书评，《南方都市报》，是他推荐过去的，书评写作对于我来讲真的是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知识结构，所以我要谢谢王老师！第二个，凌越，很好的一个诗人。

凌越： 柔韧性和复杂性是美的保证

凌越：

晓渔、成庆、小和、刘柠，他们是《独立阅读》的中坚力量，一开始他们就有一个完整的想法，刚才晓渔把《独立阅读》的想法非常透彻地说了一下。我算是《独立阅读》的一个边缘成员，因为我做媒体做了很多年，以前做《南都周刊》书评版的时候，晓渔、成庆、小和都是我的作者，他们的文章我都很欣赏，尤其是他们的那种活力，在价值观方面体现出的某些清晰的倾向，我是很认同的。我到上海出差也会把他们约出来，一帮朋友在一起喝酒聊天。后来晓渔、成庆他们弄《独立阅



读》，向我约稿，我很自然地会提供，我一直在写书评，《独立阅读》一直有出，我的书评在《独立阅读》上也一直有。我们私下见面时会聊很多，但我不太习惯在网上发言，我有时候看看独立阅读上说的好玩的东西，或者好玩的资料我下载下来看一看，学习一下。

刚才说了，我是一个诗人，我一直也这么认为，别人如果让我做自我介绍，我首先会说我是一个诗人，我写诗写了很多年，我出的第一本书是《寂寞者的观察》，我的心态其实挺复杂的，因为这个书出得挺漂亮的，但是我的诗集还没有出版过，而我自己在诗歌上花的时间，精力和认真程度，都远远超出我在批评随笔上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这个可以看出诗歌在今天的命运，但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既然我决定当一个诗人，既然我是从诗歌进入文字世界，我的出发点可能和一般的学者不太一样。最初写诗的时候，我是一个美的遵从者，我非常喜欢漂亮的诗句。但是逐渐逐渐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为了维护这种美——哪怕是一种纤弱的美——你会不断地和周围环境发生碰撞；为了维护它的纯洁，会和周围的政治环境、自然环境和人际关系发生碰撞，最后，我发现我自己完全被环境所政治化，或者说社会化。而这些东西又反过来影响到我的诗歌写作，我的诗歌不像以前那么纯了，另一个意义上讲也许变得更纯了。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在这样的关系中开始我的批评随笔写作。我希望我的批评随笔能够追求一种复杂性，追求在观念上、很多方面

的复杂性。因为如果你要遵从美的感觉，你的文章和观点本身就一定要具有柔韧性和复杂性，他们是美的保证。

这些年，因为国家的政治形势，匪夷所思的社会事件不断涌现，特别是因为我做媒体，这方面接触得很多。近些年对于写作者，对于诗人，探讨现实和写作的关系会比较多，而且大家通常会有一个道德上的要求——你怎么不反映社会，你怎么不反映现实；这种呼声近年似乎非常多。我对这种呼声其实是有看法的，我仍然是以美作为我写作的前提，如果我涉及到政治和社会，那是因为我在维护美的时候不得和它们发生碰撞。我在有关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斯坦姆的一篇文章中写到过，曼德尔斯坦姆对当时苏联现实的介入，是一种间接介入，我非常欣赏这种方式，我也一直努力这样做。曼德尔斯坦姆仍然是以词语的美作为他终极的追求，诗人最大的敌人不是腐败的政权，不是堕落的现实，而是陈词滥调，一定是这样。但是，当你和陈词滥调进行碰撞的时候，那你就势必会涉及到政治层面，因为恰恰是腐败的政权和政府他们是陈词滥调最大的主顾和拥趸，这个层面上你会涉及到政治和现实。如果是这样的逻辑，我是非常认同的。我不希望我的写作，那么美好的诗歌，被庸俗的现实和残酷的政局拉入到泥潭中间，我希望它仍然是在高处，它可以涉及到这些东西，但不是作为一种简单的应激反应。这是我自己在写作中间，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坚持的核心观念。

另外一个，因为我自己做媒体，我现在

也在做《时代周报》的“时代阅读”。我对学院派的论文写法和报刊批评随笔的写法有我的看法。我以为在西方有两个批评传统，一个是学院派批评传统；另外一个就是报刊批评传统，专门给媒体写作，面向大众，比如说美国作家门肯、埃德蒙·威尔逊、苏珊·桑塔格等等，他们都属于报刊批评传统。这两个批评传统，在我们国家都还比较薄弱。我们学院内的批评往往是非常生硬的，完全达不到莱昂利尔·特里林那样的高度和复杂性，我们的学院派批评通常是对西方时髦的批评观念简单生硬的借用，而我们国家的报刊批评传统根本没有建立，报纸上的批评写得非常随意，因为很多写作者心里都有一种潜在的轻视，觉得我是给报纸写文章，可以随便写，可以给朋友捧捧场，给哥们写几句好话，根本不把它当回事。所以现在的报刊批评类文章好的也很少。

我自己喜欢西方的报刊批评传统，我喜欢门肯、埃德蒙·威尔逊等人的文章，因为他们面向大众，有更直接的对现实切入的态度，而且他们的文笔恰恰具有高度优雅的文风，优雅的文风和深刻的观点是相辅相成的。很难想象一篇观点深刻的文章，文风是极其晦涩的。我觉得报刊批评传统在中国现在开始有一点苗头出现，报刊副刊的版面在增加，像上海书评、南方阅读，书评的篇幅都比较大，相对可以写得比较充分一点。我自己其实也有意识地希望我的文章是在我喜欢的报刊批评传统中间的一环。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愿望，做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但

是我会一以贯之。我就说这么多！

苏小和：

谢谢，我听了一会儿，凌越作为一个诗人，完美的诗人，纯粹的诗人根本和时代保持距离，疏离感，这个话题既古老又新鲜，因为诗人很容易被书评复活，失去自己写作的方向，被时代裹挟，尤其是今天这个时代看上去有那么多让人愤怒的事情，很容易让诗歌成为他干预现实，参与现实的工具。在我看来，诗人要真正做到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保持疏离感也是挺难的。我们知道穆旦这样的诗人，诗写得不错，这辈子有一个很宏大的国家主义情绪，所以他会去打仗，在美国呆得好好的他要回来，让自己的诗歌写作从此中断。闻一多这样的诗人非常有激情，参与现实，诗歌也没有写得特别深入，也是死于非命。还有很多的文人也是，过度的参与了现实，导致文本的荒芜。另外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沈从文这样的作家，跟时代保持了相对的距离，所以能够有好的东西，张爱玲，做学问的也是，钱穆，看怎么看了，我是很爱听凌越这样的话，因为人是一个长期性的载体，不仅仅属于他所在的时代，尤其是对于写作者来讲，生命是打通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是持续性的，甚至是永恒的。所以你的写作如果没有永恒的纬度，很容易腐朽，我是很羡慕凌越的，我跟他认识很多年了，他一直是特别特别的诗人，他不是搞行为艺术的诗人，而是文本层面的诗人，一直在坚持写作，写得很干净，非常好。接下来刘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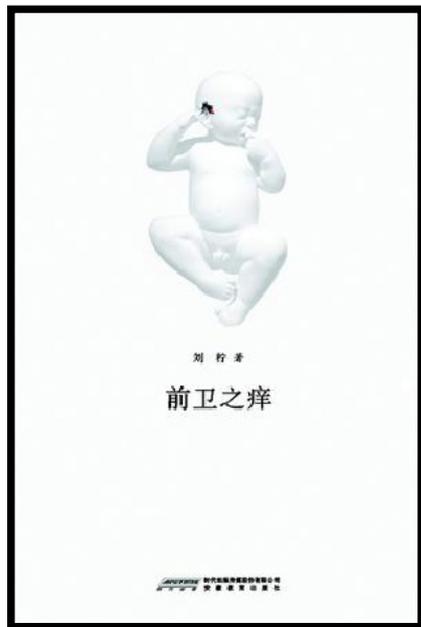
刘柠：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勾当”

刘柠：

我是刘柠，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谈独立阅读，以及这套“独立阅读”丛书，我所谈的内容也是围绕这两点，第一是我自己的阅读生活，包括我跟《独立阅读》的关系；第二，我想回到这本拙著，我的《前卫之痒》，谈一点我跟艺术的关系，以及我对于当下中国前卫艺术的判断。

我先说第一个问题，《独立阅读》几个成员都坐在这里。我有点忘记了，我最初好想是被成庆拉进来的。我进来也是很偶然，成庆是以前我们办的另外一个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有关的《纵横周刊》的成员，这个刊物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难以为继了，我便被拉到这个平台来了。来了以后发现，这里碰鼻子碰眼的都是媒体写作时的一些朋友，有的人是很熟的朋友，有的人是久闻其名，未谋面的朋友，所以一开始就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开始不倦地为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勾当”写作，甚至也不问发表等等。其实有的时候，被催稿很厉害，手里还有必须要写的稿子，那就不得不停下来，先把独立阅读的东西弄完。

这两年我就觉得在这个平台里认识了这么多的朋友，优秀的诗人、经济学人、历史学人，我们觉得有一种意气相投的天然的亲近感。虽然就个人来说，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学术背景，比如说小和，经济学的，凌越是诗



人，晓渔，成庆是历史学者。我就觉得在这样的平台里面，实际上我们相互之间更加意气投合的，是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种非常宽松的、散淡的，有一点点像文人，但是又不是特烂的文人，那样一种情绪，这样一种共通的色调把大家维系在一起。作为我个人来说，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幸运。

其实我对于阅读，我们作为一个所谓的“知道分子”，每个人的阅读生活，肯定是在独立阅读之前，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所有的，对我来说有用的知识，对于这个世界的深度理解，最主要的途径都是来自于个人阅读。其实学校所给你的东西，是相当有限的，我记得过去我会非常认真的

读读书杂志，凌越兄当时主编老《书城》的时候，我也是一期不缺的，从创刊开始读的老读者，我会一期不缺的买来看。现在我也保持看一本书，看一个刊物，或者报纸，先从副刊看起，书评看起。而且今天各大商业媒体，他们的书评版都很大，有时候需要花很长时间来看这些书评版。比如说今天我出来之前，上午起来以后第一时间，一边喝咖啡，一边在电脑前看《上海书评》。今天介绍了一个经济学者。上海书评后面有很多的版面，最后一个是“书房”，我都是要先看的。今天介绍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者韦森的书房。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同时有着深厚的哲学、人文背景，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对书评的阅读常常带给我很多的惊喜。星期天，比如说读《上海书评》，读南都的书评，有时候也会读凌越编的《时代周报》书评，这几个书评版仔细读一遍，一天的时间基本上就过去了。碍于个人专业的关系，我还读日本《朝日新闻》书评，《日本经济新闻》书评，《文艺春秋》上的书评，我也都读得非常仔细。这些年来，基本所有知识都来自于个人阅读。你读哪一本呢？我大多数都是从这些书评版，有些书评版上的文章就是包括在座朋友们写的，他们起了非常好的学术向导的作用，我个人也感到非常幸运。

当然了，碍于个人专业背景，我必须读的书，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日本研究，日本问题，还有一个是与艺术，特别是视觉艺术有关的东西。作为专业阅读，是需要深度阅读的。同时，我们独立阅读上频繁介

绍的，包括当下的一些畅销读物，包括一个知识分子，作为公民，与人格成长有关的东西，也都是必读的。所以我想有的时候，如果我不认识独立阅读的这些人，如果不参与独立阅读的事情，我可能读书会更加纯粹，更加精深。加入了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勾当，我确实不得不分心做很多与我的专业没有关系的问题，去为这些问题花钱买书，花时间去阅读，但其实这是非常好的。无论你是哪一个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你都是要有一个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思想者最基本的底色。这样一种最基本的底色，主要是取决于你平时所接受的知识性阅读，而且通过这些阅读，你再回望你所生活的当下社会，就会激发出作为知识分子深度的问题意识。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思想者来说，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姿态。

当然，这件事情一方面是理想主义勾当，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我个人每次在独立阅读发布新刊之后，我看晓渔，小和，成庆他们的阅读报告，当然都是方方面面的，我都会马上跟着下单，在卓越上，京东网下单去买书，所以独立阅读是非常费时也是费银子的事情。家里的空间是有限的，再置业是完全不现实——这是一个困惑的地方。困惑虽然困惑，这件事情肯定会乐此不疲地做下去。这是谈了一下我跟独立阅读，还有阅读本身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我就是想回到我这本书，谈一下与艺术有关的事情。什么是艺术？所

谓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完全是见仁见智，因人而异。而且我觉得可能世界上不存在为学术界、文化界、艺术界所共同接受的“艺术”的定义。因此，我们只能用对这个命题的反命题来判断——什么东西不是艺术。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现成的答案，是个人是非常认同的一些答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高尔泰先生，他是一个美学家，当他谈到艺术是自由的创造这个命题的时候，他说“总之，举凡一切不是以主体的内在感性动力，而是以客体（这个客体就是受其指令或迎合其趣味的他人）的规定性为依据的艺术都不是艺术。”比如说日本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冈本太郎——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那个非常怪异的标志物，那个太阳神塔造型的设计者，他说，原文是日文，大意就是说“艺术不能太好，艺术不能是漂亮的，艺术是不能让人舒服的”——这是他的定义。毕加索说（大家都知道毕加索是划时代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到今天也难以超越的现代艺术的一座巅峰）：“当我独处的时候，我没有勇气以艺术家这个古老伟大的名词的意义来想象我自己是一名艺术家。我只是公开卖艺的人。这个人了解他的时代，并且竭尽所能地扮演了与他同代人的种种愚蠢、贪婪、杂耍。”最彻底的是德裔艺术评论家、贡布里希，他说：“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我想，通过艺术史上这些伟大人物的话语，我们大概能够对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做出个人内心的判断。

那么，前卫艺术是什么呢？实际上我这本书里谈的前卫艺术，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广义上的视觉艺术，大家在798、宋庄所看到的这类艺术现象，我把它统称为前卫艺术。但实际上前卫艺术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并不依赖于你是绘画、装置、多媒体，而仅仅唯一取决于你的艺术所表达的内容。比如说70年代到80年代出中期，那时候可能像“今天”派的朦胧诗，凌越老师所写的那种现代诗草创时代的“朦胧诗”等等，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前卫艺术。乃至80年代到后来，朦胧诗有一点式微以后，探索电影，先锋戏剧等等，就成了那个时代的前卫艺术。实际上我认为前卫艺术看它到底是不是前卫的，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看艺术创造者的姿态，是不是以一种先锋的姿态站在社会的前沿，对于这种当下的一些非常迫切而重大的问题，一些基本价值，能够以艺术的形式有所回应。

真正的前卫艺术，不会回避当下的一些深刻的社会问题，或者说一些重大的价值，这个不可能在前卫艺术中缺席。而如果用这种判断来观照今天的前卫艺术的话，我对中国当下前卫艺术的判断，实际上是持批评态度的，实际上是失望的，总体上确实是失望的。我有过为本土的前卫艺术非常激动的时期，实际上在2005年之前，那个时候我住在望京，离798只有两站之遥，我眼看着798从一个还没有看板，一半是工厂，一半是烟囱的这样一个工业时代文明的遗迹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所谓“艺术”，或者说所谓“时尚”的

跑马场，里面混搭着各种各样的情绪，或者说“文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看破了中国前卫艺术的生态及这种艺术生态之不健康，甚至是有害的一面。对这一点，我是非常失望的。但是在当下，我们对于前卫艺术的批评，实际上是有一定风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前卫艺术，比如说像在佳士得、苏斯比等国际拍卖行，诸如前卫艺术“四大金刚”等等，他们都获得了高度的成功。不像过去，即使成功如毕加索者，其所获得的成功，从金额、标的上来说，跟今天的本土前卫艺术这些大佬们相比，可以说完全是小巫见大巫。那么，是不是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如此大的辉煌、成功，中国前卫艺术就很牛了呢？中国前卫艺术这些年的动静太大了，跟中国崛起等等是完全同步的。但它在经济上越是成功，实际上我们越发看清一种非常悲催的现实：越是成功的艺术家，反而当初那样一种非常前卫的、先锋的姿态，那样的一种关照社会当下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在一步一步地沦丧。

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事情呢？因为今天第一是在经济上它确实非常成功，到今天仍然很成功，虽然它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同时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你批评今天的前卫艺术，但它已经通过经济上的成功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正确性。这就跟你批评同志现象，同性恋似的。比如，今天这样的场合，你批评同志，或者是在微博上批评同志的现象，会被认为这个人是不宽容的，或者说是非常狭隘，没有教养，甚至是

反社会，反文明的。为什么呢？同性恋、同志现象基本上在主流的文明社会都已经高度政治正确化了。今天的前卫艺术就是这样的问题。一方面，问题意识几乎是沦丧殆尽，同时又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通过这样的经济成功，获得了巨大的话语权和政治正确性。奥运以后，中国成立了一个当代艺术院，我们过去大家所知道的，耳熟能详的，那些所谓几大金刚，那些长头发或没头发的艺术家，前卫艺术家，他们都成了艺术院的院士。而且非常反讽的一点，这样一个高度体制化的机构成立了，邀请这些大腕儿过来，聘请他们做院士的时候，那些在佳士得拍卖行取得了高度成功的大腕艺术家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说不，而是乖乖地接受了这样一顶桂冠。虽然他们知道这个机构是一个国家的，类似他们最厌恶的中国画院、中国作协这样的机构，但每个人都是老老实实地，甚至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样一顶桂冠，成为体制的一员。这种姿态，如果说你是一个以其他形式艺术创作的人我还可以理解，但是你的表达形式是被称为“前卫艺术”，非常先锋的，要对社会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批判的艺术形式，这就非常反讽了。然而遗憾的是，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殊荣”，我觉得这是中国前卫艺术艺术圈的怪现状。所以说我对这种现象，乃至对这样的本土前卫艺术的现实是高度失望的。

正因此，大家届时在读我的书的时候也能看出，我只好把个人的目光放到过去，乃至海外。过去乃至海外，包括毕加索等等这样

赫赫有名的艺术家，他们也面临过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他们成功以后。而实际上当我们看到他们人生的故事，看到他们在艺术创造过程中如何应对诸种问题之后，我们对今天的所有前卫艺术的问题，都释然了。我就谈这些。谢谢大家！

苏小和：

谢谢刘柠，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词，爱书如命，嗜书如命，刘柠兄就是这样的，他在大老爷们里面是非常细致的一个人，他的细致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书上面，家里藏书很多，非常非常的有细节感，这个书设计的这一套挺漂亮的，干干净净的，开本，里面的字，封面都是挺文艺的，挺好看的，这都是刘柠兄的功劳。

成庆： 中国人的生命到底有什么价值

成庆：

谢谢各位，我先讲一个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前天晚上来北京之前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回到大学时代，三门挂科。为什么做这个梦呢？因为我大学成绩真的不好，我本科是学理工科的，但我偏偏喜欢读文科，但是却没办法转系，虽然一直想从事文科的工作，当时我还要学什么模拟电路之类的课程，90年代时候甚至还有电视机修理的课目，不过电视机的后盖我从来没有打开过。谈这个事情，对我而言，是想说，阅读其实是

刘柠：

这个主要还是设计师，这个设计师本人是河南文艺出版社的设计师，叫刘运来，是一位获过很多优秀大奖比如中国最美图书奖的设计师。我只是代表丛书的几位作者最后把了一下关而已。因为我这本书是关于艺术的，而且中间有很多的插图，我非常担心它的品质，所以我频繁地跟出版社编辑沟通，给他增加了很多压力。这是一个丛书，要保持体例上、风格上的大致一致，最后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苏小和：

我特别担心，哪一天纸质的书没有了以后，刘老师怎么办，很有意思。独立阅读的每个人都有特点，我待会儿再说，现在把时间交给成庆。



解决我人生问题的一个方式，他不是一门职业，虽然现在在大学历史系任教，但实际上我是严格的区分了专业研究和公共阅读，或者说公共写作的一个界限。我通常认为，作为一个现代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体，首先不应是一个专业人，而是有着良好知识视野的、全面的读者。因此，我觉得从我小时候的阅读史来看，我从来不是想要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而是作为一个拥有广泛视野的读者去阅读的。我个人从小受家庭影响，中间也有很多机缘巧合，比如小学时金庸武侠小说全都看完了，当时很多字还不认识，就直接跳过去，阅读起来也没问题，那时候还很喜欢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来稍微长大之后印象最深刻的情节，就对冬妮娅那一段特别有兴趣。后来也很喜欢读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这是关于民国一对科学家爱情故事的小说，年轻人或许都不大熟悉了。这样的阅读对于我来说是基本上市盲目的，只是一种天然的寻找方式。

进入初中时，我偶然地读到了《中国走进死胡同》，突然对政治开始感兴趣，这是很奇怪的转变。直到后来进入大学时后，开始阅读政治理论、政治哲学，例如哈耶克等等，这段政治理论的研究或者是阅读的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这当然是跟这30年改革的背景有关系。比如你遇到任何一个人，甚至遇到一个白领都可以跟你谈政治理论。虽然他的政治理论知识往往是从网络上获得的，但是他明确的有一个思想背景，那就是思考政治问题。

不过当我读了政治理论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比如前年我家里发生一件事情，父亲中风，本身问题不大，但他却表现得比较脆弱，我想这大概是他对死亡的恐惧造成的，但是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纯正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虽然他得胆子很大，他经常跟我说，他小时候经常半夜走过坟地，也觉得无所畏惧。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这么一个唯物论者，这么坚定的共产党员，为什么会对死亡感到如此恐惧。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并不是说我认为老人们胆小，而是说在我们的生命中，作为年轻人，其实已经开始面对死亡的问题。所以说，这些生命的议题都需要一个东西，让你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样来解释，这样来实践。其实阅读最终、最关键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在生活中实践。

比如说，刘柠兄很爱书，日常生活中可以充满了与书相关的东西，他的阅读，他的写作。但对于很多人而言，如果一种阅读仅仅成为一种展示，那我想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我今天跟你谈阅读了谁谁谁的小说，假如那里面的人跟你没有关联的话，我想这种阅读其实是一种属于文化生产性的消费。我之所以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是因为想提醒大家，时刻不要忘记了阅读的初衷，佛教有一句话说，“学道之人，莫忘初心”，也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忘记最早的发心是什么。我发觉现在很多的大学生，或者是年轻人读书有一个问题，看到这个书大家都

在说，都在谈，但是其实它跟我其实没多大关系，于是读了就读了，似乎对自己的生命也没起到多大作用。

所以阅读对我的意义，其实是想处理我们今天这30年转型的一些社会问题、意义问题等等，这也是我这种三十几岁，包括二十几岁，甚至十几岁后来的阅读者面临的问题。我们今天阅读不是文化生产行业需要我们去阅读，需要去制造消费，而是我们真的有很多人生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靠阅读去解决。

至于这些根本问题，可能有两个大的方面，如果粗略分类的话，一个就是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政治的理解，比如很多人想要实践，要改造这个世界。另外一个方面，大概就是个人存在意义问题。比如很多人热爱诗歌，热爱艺术，我想大概都是从它的存在意义获得自己的方向。很多人，比如晓渔的这本《重返公共阅读》，所表达的是在社会层面对自己的改造，对自己公民性格不断的修缮。

这两方面对于现代人来说，包括我自己，是要处理社会生活当中，乃至个人独处时精神生活当中所面临的两个重要方向。我不相信，一个只有政治方面追求的人，精神境界会有多深邃。比如说以赛亚柏林，他本身一个很好的古典乐的欣赏者，他有一个很有名的钢琴家朋友，我突然一下忘记了，对，是布伦德尔，他经常在柏林面前演奏，因为他了解柏林是一个懂音乐的人，大家都知道柏林本身是一位政治思想史家、政治理论家，但他在人文方面的素养丝毫不逊于许多

艺术家。因此西方的优秀学者和思想家一般都会同时具有两个面向，但是今天的阅读者，有时候会忘记，在个人的精神生活与社会的政治参与过程与公共生活当中，这两个维度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一分为二的。我很怕那些认为阅读政治理论就是搞政治的看法，阅读政治理论不是让你“搞”政治，而是让你理解政治。我发现很多人读政治理论，就认为政治就是“权力”的游戏，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政治哲学本质上是关于人性的理论，关于人性的理解，这种基本态度很多人并没有感觉到和意识到。

我这本集子里共分了几部分，有乐评，有时评，有书评，大概都是在上述的两个维度上来对我个人从小成长的经验所作梳理。比如我描述过曾经的同窗，曾经的朋友，曾经的邻居，我以前的邻居就是车祸去世了，我的初中同桌也是车祸去世。我们经常会发现，当有时候回忆时，发觉很多不正常或者正常的事情常常被我们忽略掉，但在一定时刻却被被一些事情激活了。比如说我初中一个同桌，很漂亮的一个女生，有人告诉我她车祸死掉，但却到几年后我才认真思考她的死亡对我的意义问题。相信在这里的许多朋友，都曾经有很多小学的同学，中学的同学，我们一起成长，为什么最后的命运都不一样，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思考，其实说明了我们人生当中很多议题并没有被阅读激活，这些经验都很珍贵，如果每个人认真的回想起童年的经验，一定会在阅读当中，某一个作者那里寻找到很强烈的共鸣。

这本集子里还有时评、书评的部分，可能就是理解的人世的一面。当然还有乐评，这属于很私人化的东西。我的运气不错，曾在波士顿访学一年，其实就是听了一年的古典音乐，波士顿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之城。虽然我写的乐评很烂，不登大雅之堂，但是却是清理个人体验很好的方式。如果你对古典音乐有兴趣，你会理解，聆听古典音乐是完全个人化的，甚至坐在音乐厅里面，旁边的人都不会与你发生关联。比如有一次听完一场很棒的音乐会，旁边一个老太太来找我说话，大赞精彩，但是我很激动，却根本说不出话，因为我觉得那个体验没办法用语言的方式与别人分享。当回到住的地方以后，常常是当晚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否则根本没办法记住这种体验，因为这个体验是很短暂的，也是很珍贵的。比如我听巴赫的许多作品，真的有很多类似于宗教的体验。我也问过很多爱乐的朋友，他们也有这种感觉，这是很难与别人分享的体验，只能说音乐激活了我内心的隐秘内容。

关于书的其他部分我就不多说了。最后我想说一句话，所谓“意义的疆场”，是想说，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面临这个问题，他们对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的思考。而我们在30年事实上缺乏很重要的生命教育，不仅仅是专业教育，而且还有生命教育，我们并不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的生命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当然现在许多人说，我们为了赚钱有让生命有价值，实际上这个价值显然是

很脆弱的。所以如果我这本书能让大家能有所兴趣的话，大概是体现了一个想要把这部分生命意义的东西浮现出来的努力，这个努力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对于他人，如果能引起共鸣，当然是更好的事情。谢谢大家！

苏小和：

成庆我们跟他交往很多年，有时候我们在MSN上经常聊，在我看来他是内心非常非常纤细，敏感的人，关于生命的意义，不仅仅是在阅读，可能也是在寻找，看了他这些年阅读的方向，对音乐的趣味，个人信仰的生活让人很感慨，事实上他年纪不大，30多岁，关于生命风景思考的特别多。大家有没有发现四个人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这是独立阅读最大的风格。我们虽然有这么多人，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从来不会互相串味儿，大家都坚守自己的个人趣味，我用了一个词，我们又能彼此“喂养”，我们之间非常非常有个性，每个人都不一样，而我们在一起大家又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也没有所谓的文人的毛病，文人相轻之类的都没有，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在任何名和利方面没有冲突。对于我个人来讲，独立阅读带给我们的是非常周全的精神世界，而且我是一个很宅的人，我所有人际圈子就这么一个圈子，独立阅读这个圈子我是特别迷恋的，我跟凌越兄一样写了很多年的诗，但是我从来不与诗人混。大家也知道我学经济学，我也不跟经济学圈子混，我觉得经济学圈子充满了名利，特别

严重，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我很尊敬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关于双轨制排名的问题，当年莫干山会议，几个年轻的经济学者找到一个词——双轨制，今年得到中国经济学创新奖，就为这个词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当年的朋友撕破脸，友谊也不要了，成

为仇人。这种事情在独立阅读的圈子里面，我想应该不会出现，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地方，每每想到这里，很有触动的地方。所有人阅读，我们既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天将降大人于斯人也的使命感，我们就是寻找生命的意义，非常的有意思。

苏小和： 我们阅读和思维的软肋

苏小和：

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就到这里，因为还有一点时间，临时我自己琢磨了一个环节，也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环节，不知道在座的四位愿不愿意，先从我来。我这几年随着我阅读的范围有一点点扩充，我不断的问自己我的软肋在什么地方，我阅读的软肋，思维的软肋在什么地方？因为我的兴趣太广泛，搞什么都不精，因为我是双子座的人，一堆的想法，但是什么都搞不定，比较浅薄，所以我有经济学的，有诗歌的，对历史也是挺有兴趣的，管理学的东西也是挺有兴趣的。思考来思考去，今年我开始回忆我的缺点，我的数学也不好，经济学，尤其是当代经济学需要数学作为工具，我也搞不定。所以我找到一个比较适合我的，经济学史，经济学和历史搭建起来，寻找一些关键词。我做了一个课题，快一年了，对于我有一种夯实的感觉，让我自己落地的感觉，所以我也愿意把这样的心路历程拿出来分享一下，你怎么去发现

你的阅读或者思考的方向上的一些缺陷，不知道他们在座的四位有没有像我一样做这样的工作。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都是讲自己比较擅长的一面，比较有经验的一面，有没有软肋的一面。

王晓渔：

软肋很多了，喜欢说软肋，特别害怕表扬自己。首先我现在发现，500页以上的书越来越读不完了，看到一本书如果是上下两本，我就没有耐心读下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很多，包括极不喜欢写作，但是偏偏我做的工作跟写作有密切的关系，我一直觉得，如果不写作，只阅读，这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很多软肋，包括经常早上三四点钟才睡，也是软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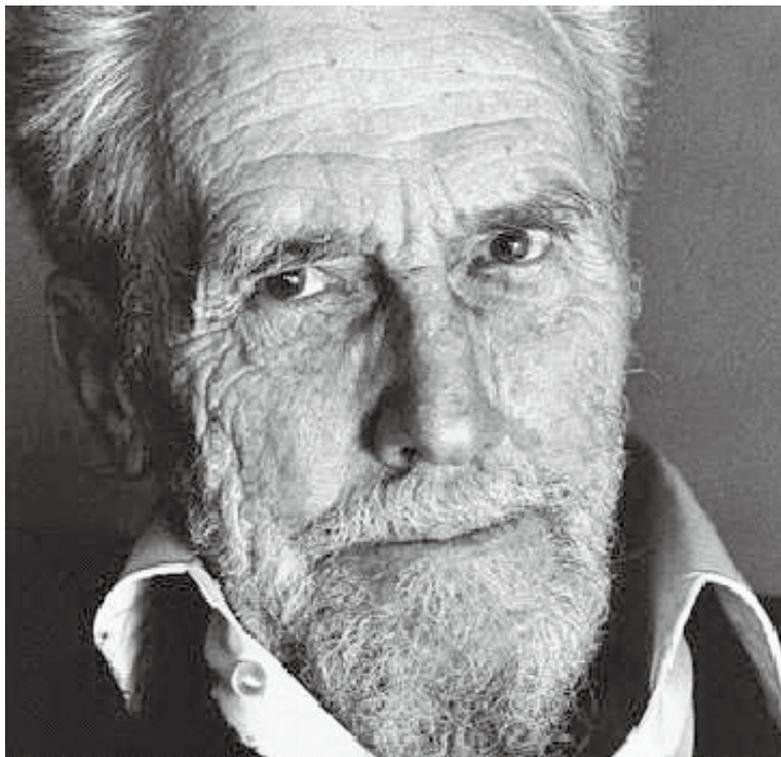
凌越：

我想所谓软肋我理解就是自己的困惑。近些年对于我来说困惑最大的一——因为我

是一个诗人，我对修辞这一块儿，对词语效果这一块儿是非常非常注意的。另一方面，中国的现实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太多荒谬的事情，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事情。我在这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时候，往往顾此失彼，这是我最大的问题。当我注意词语效果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不是太奢侈了，当我关注现实的时候，我又会觉得我是不是背离了诗人的本分。当写得最顺手的时候，好象可以在这两者之间驾一座桥。我的阅读软肋——我对美国诗人庞德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庞德给后辈诗人默温寄的一张明信片上有这样一句话——阅读种子而非嫩枝。他实际上是在说要阅读最好的最经典的作品。我自己的阅读是往回追溯的，虽然我写很多新书书评，实际上我自己的阅读是往回走的。比如说戏剧这一块儿，我的软肋就是这些古典的东西，我读得还远远不够，比如说我会花很多时间读莎士比亚戏剧，读古希腊戏剧，但我觉得这方面还有很多经典作品，我还没有读到，还要去把它们搞掂。

刘柠：

晓渔说软肋很多，我突然想到一句日文，直译过来就是浑身都是软肋的意思。直接来说，作为一个中文系出身的学生，我个人非常羡慕学历史的人，像晓渔、成庆那样的历史背景。一个有深厚历史背景的学者总是令我无限景仰。刚才凌越说回溯式的阅读，我们回到鲁迅、胡适等那代人的时候，尤其是鲁迅，他如此地洞彻历史。在我们来



说，当然有时代的问题，有教育传统等等方面的问题，这是我们永远无法超越的。但是我确实非常羡慕历史读得好的人。因为我无论是做日本研究，还是做艺术方面写作的时候，我都痛感有没有对历史的系统训练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说我现在也在读艺术史，我认为对于历史的了解，我对艺术史，可能比对其他的诸如日本史、中国近代史等了解更多一些。但是，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的话，用贡布里希的话说，“艺术史之于一个艺术家，就像鸟类学之于鸟一样”。鸟，无论是好鸟，还是不好的鸟，都不需要鸟类学。但是，作为研究鸟的人，或者说研究艺术的人，因为你看不到相关的背景，比如说超现实主义时代的，轰动性的这些个展等等，都已经成为历史了，除非在安迪·沃霍

遇刺多少多少周年时，再举办一个相当全面的回顾展，否则几乎没有重温历史上伟大经典作品的机会。所以我们只有从艺术史中来重温这些东西。

你冷不丁观看一个作品的时候，因为你已经离开了那个时候，比如说超现实主义时代，比如说印象主义，你已经脱离了那个时候的语境，为了理解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品，它为什么伟大，伟大在于什么地方，伟大到什么程度，便只有从艺术史中寻找答案——这是软肋之一。

第二个软肋，我顺便回应一下凌越在刚才演讲中说的一个问题，凌越把写作分成学院写作和媒体批评。因为凌越是诗人，诗人总是对文体非常敏感，这也是我个人思考的一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所谓学院批评、学院写作，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刚才成庆也说，即使对于成庆这样的学院派，也是把职业的研究和个人的写作——我自己愿称之为“生命写作”——分开来的，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分得很清楚的。作为我自己来说没有这种职业的需求，我根本不需要写学术报告，去做一个什么课题。而且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学界不知道在做什么，像一群巫师在致力于某种高度私密的、一种像祖传的秘技一样的东西，已经越来越诡异了。这种东西如果缺乏足够的进入公共领域的通道的话，我内心高度怀疑它的意义。凌越说的传媒批评，媒体批评这一块儿，日本等传媒高度发达的国家，有深厚的这方面的批评传统，也从媒体这一块儿孕育了很多这

方面的大师，我们知道的丹尼尔·贝尔这样的社会学者都成功于媒体。反观今天本土的媒体，今天的环境可不可以造就这样媒体批评的高手，可以说在学院体制、媒体体制之外孕育大师的这么一个孵育机制，目前似乎还看不到这样的希望。我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我觉得在学术体制与今天中国传媒写作之间，是有一种处于这两者之间的表达形式，既深深的立足于学术性的资源，同时又有传媒性的、去专业化的表达方式，能够使它最有效地进入公共。对于这个，我个人是乐观的，随着媒体生态健康的发展，我个人还是乐观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

成庆：

说起软肋，我的后记都已经写过，我在这里念一下：“这本书之所以取名叫《意义的疆场》，是说今天这样的上不接传统，下不开未来的夹心人，在对世界与人生意义的认知与摸索方面呈现出某种碎片化与盲目的局面，热爱学术却缺乏系统的传承，热爱思想却往往对各种意识形态纷争不知所措，热爱艺术却流于票友心态。”这是我自己认识到的自己的软肋。

具体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我硕士是做的民国思想史，博士论文则是做的晚清思想史。从阅读的角度来说，我发现越往前推，我的理解的能力就越弱，现在我开始读晚明思想，感受尤甚。我们对于传统的理解往往具有很多的意识形态框框，我们其实缺乏对古人生活与思

想的真正理解，比如我们真正理解晚清文人的思想吗？就康有为的知识结构而言，我们现代人根本无法进入他的思想资源，因为他有儒家的方面，有佛教的方面，还有周易、道家的方面。我看到很多研究康有为的学者，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么复杂的面相，不要说往前推到先秦的思想了。

我做学术研究的时候，遇到非常大的苦恼，并不是文献上作考据或者是类似于文字的考订。而在于我根本没办法理解他讲的思想到底是什么体验，当一个活生生的古人站

到你面前，你跟他谈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真的能理解他吗？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而是这个时代，包括学院人和阅读者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把传统给简化了，把西方化也符号化，我们没办法理解所谓优秀的思想、优秀的作品。今天的作者虽然在很多方面，比如思想的开放方面远胜于80年代，但是很多方面还比不上80年代那些没有任何功利性来阅读作品的读者。这只能说明，我们今天的理解能力是在减弱，而不是在增强，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的困扰。

互动： 在这个荒诞的时代，我们怎么坚守内心的风景？

苏小和：

刚才算是一个规定动作，为什么要走这个环节呢？事实上我是想讲一个关于独立阅读几重属性，第一个属性，当然是每个人都要构建自己私人的阅读生活，第二，你要构建起怀疑自己的能力，第三，我们跟网易在气质方面很契合的，他们是公民阅读，我们独立阅读也是有公民尝试阅读这么一个关键词在里面。之所以我们做了快五年了，受到大家的欢迎，就是这一点，接下来是互动环节，在这么一个喧嚣的时代，价值观错乱的时代，我们怎么生活，怎么思考，有一点抽象。

提问：

15世纪印刷开始，阅读变成很私人性的事情，印刷把大量的思想，大量的书本传播

到全世界，从此每个人不再到修道院里读手抄的，羊皮包的经典，自己可以每个人都很公平的，只要识字，都可以在自己的书房里面，自己的马桶上面来读书，读书变成一件很私密的事情。我要问晓渔一个问题，《重返公共阅读》，这个意义上讲，阅读本身，从15世纪开始是私密的事情，通过私密的事情，又把思想变成了公共性的事情，大家都可以交流思想，通过阅读，对作者产生一种崇拜，对思想产生一种敬畏，或者我反对这种思想，想方设法到其他地方再讨论，提出更新的意见，再去写书。阅读一方面是私人性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很有意思，这种私人性的阅读，会产生一个现代很多公众性的问题。我有点不太理解，因为我不做这些东西，我不太理解，现在的公共阅读，怎么摆脱，具体含义上

来讲，跟原来私人阅读，私密的事情，哪怕是我读公共性的问题也是私密的阅读，这个是怎么来转换的呢？

王晓渔：

我的阅读主要也是在自己家里，不会在街上。我指的公共性是内容上，我读的这些书不是和我的工作有直接关联，而是跟我的问题有关，这个问题涉及到一定的公众性。如果说公共阅读要更清晰一点，就是公民阅读，网易所说的公民阅读。我们知道公民社会这个词已经很敏感了，所以我就把公民这个词回避了，变成了公共阅读，就是这么简单的。

提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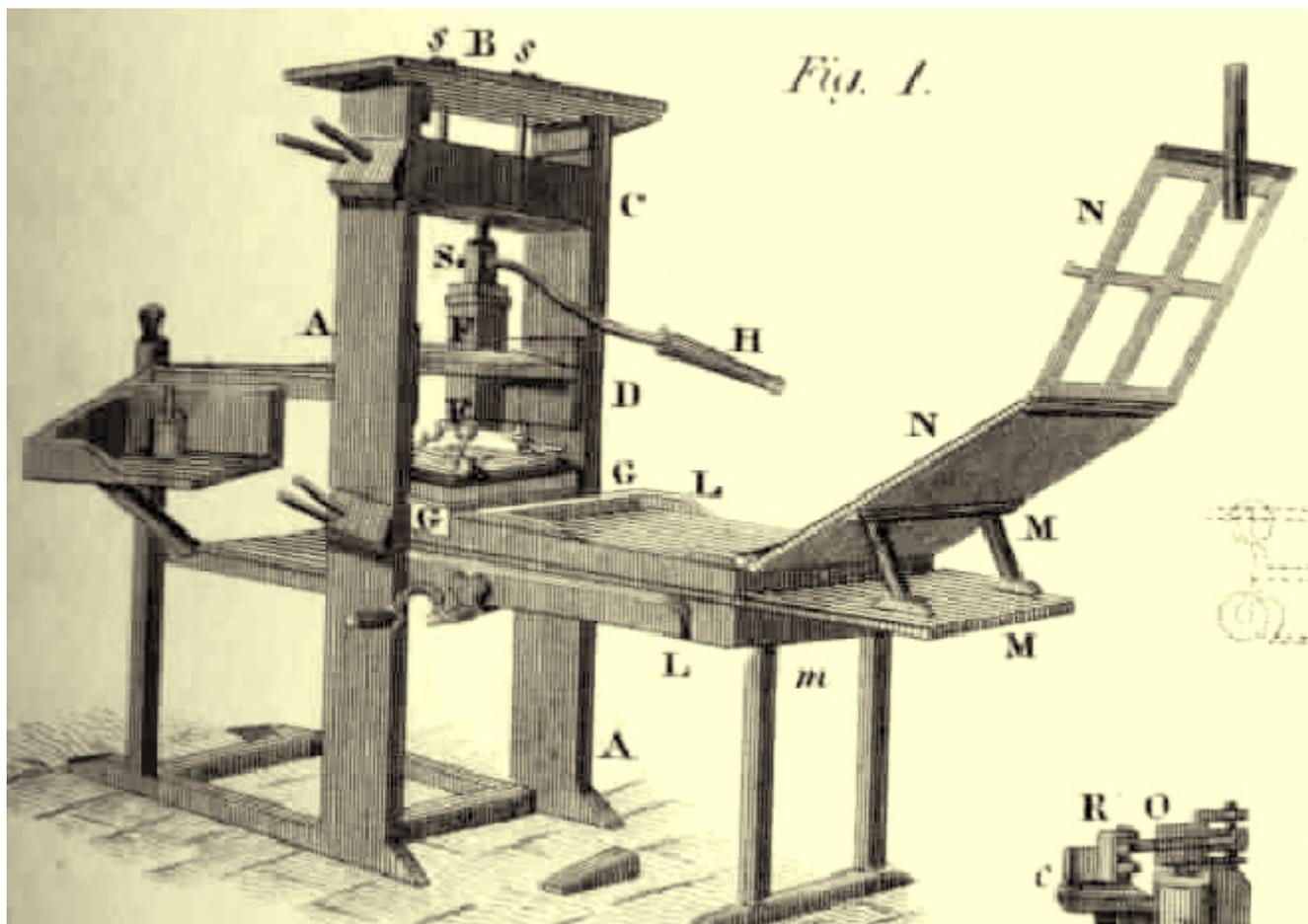
是不是跟读《圣经》是同样类似的方式。

王晓渔：

公民阅读是一种祛魅的阅读，读完以后不是一种神话式的阅读。

提问：

我想问一下成庆老师，感觉我们的年龄也差不多，看了你刚才的介绍，我的经历跟你是很相似的，包括现在碰到的困惑也是很相似的，包括你刚才讲的一些朋友们，你身边



图为古腾堡印刷机

的人也已经离开，我也是切身有感受，因为这个年龄，从我的亲戚，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昨天还见到，第二天就走了，这些都很有感触，我也在追求我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成老师，你刚才讲到你的软肋，我也很有感触，我现在也是在读博士，存在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研究是碎片化，也不是很成体系的，也不可能很多观点都是成体系的，这个要怎么去解决。我现在有一点困惑，对人生的追求，对人生的意义我坚持在研究，可能会转向到宗教的研究，或者去了解它，但是怎么去看这么多东西，确实感觉没太多的时间去看它，包括对自己的工作也好，对自己私下人生意追求也好，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个人想宁缺毋滥，感觉到好的我再去看，不好的确实不太想去看，看了以后可能影响我自己的看法。

第二，我更多的是一些观点的东西，你的观点我喜欢跟大家交流，如果你的观点是我可以接受的，我会跟你探讨。我想问一下成庆老师，你对你的软肋是怎样的想法，想解决这个问题，想交流一下。

成庆：

其实最重要的是时间。我本人现在是在做思想史研究，但以前是学工科的，我进去读了四年硕士生之后，我的老师才跟我说，你终于入门了。但我想今天这种高等教育培养机制是很难允许一个人能够心无旁物的花四年时间来作入门的工作，或者说认真地读思想类的书籍，因为他需要你快速的

出成果，快速的发表，快速的评职称，快速的把你的教职升迁上去。从阅读来说，首先你要有足够的定力，你要知道是为自己而阅读，为自己而思考。到了后来，你会发觉你这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的阅读，最终化为生命基本的认同、基本的肯定，最终当你地当下生活都能肯定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时间效果就会真正的显现。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大学同学，他们基本上很早就已经买了房子，很多生活水平都很不错，大多数人就会说，我们这些读书人要怎么样应对社会我提出各种的经济要求，作为一个阅读人，或者是一个读书人，在获取物质利益方面显然是难以与其他职业竞争的，而我的看法是阅读与思考是不能换取这种物质利益的。不过许多人都会有类似的困惑，当你告诉他，读书当然是好的，价值上更高一些，这个解释其实是很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再把物质跟我们的思想作为两个同等的东西来比较，就像同时放在天平上，突然这个时代的风气告诉我们物质更重要一些，物质这一端就会沉下去，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如果对思想感兴趣，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能让你心安，让你觉得投入再多的时间，金钱是理所当然，无所后悔，这种无所后悔不是每天躲在家里说我不后悔，那是一种自我逃避，自我掩耳盗铃式的心理安慰，而是真正意识到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我们不可能在一切方面一帆风顺有的人就是容易发财，有的人就是没有好的运气，有的人因为很

偶然的原因就去世了，为什么他不来追问这是为什么？其实到了最后我发觉，阅读最后带给我们的效用其实是，我认可了这是我生命的存在方式，作为一个读书人，我存在的方式就体现在这方面。周围的物质主义对于我来说，当然要抵御不断的挑战，但是我自己是心安的，这一点尤其重要。

现在学院里面读博士的人，我接触了很多人，他们大概有两种现象，一种是想靠读博士为了更好的生活，一种是认为我读博士就是读一个博士学位而已，这两种心态对于今天读书人来说是一个悲剧。但是更大多数人是没有在学院系统里面呆的人，他们则要把阅读当做一种生活的方式，人来此一世，一辈子走一遭，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认识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苏格拉底，耶稣、佛陀所提的关于人性的根本问题，它的根源是什么。到了这个层面，很多人开始接触宗教，这大概是因为思考人生问题到了某一个阶段不可回避的地方。我们昨天其实还在讨论，史铁生、高尔泰他们的晚年文字，到最后都会变成一个对信仰的讨论问题，至于能不能进入信仰，这是每个人的造化，每个人的缘分问题。我们之间的体验很多方面大概是相同的，可能每个人追求寻找的方式稍微有些不同，方向都是大概一样的，谢谢！

提问：

我有一个读书的朋友跟我说过，人从根本上是无法沟通的，这个东西就是自己的思

想，当写出来的时候，成系统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一半的意义。在阅读的时候，是对这个作者本身来了解，而是通过这个作者了解自己的内心。另外我今年20岁，我认为我是在价值观形成的期间，我也读了一些书，在现在这个时代可以知道很多的主义、思想，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前一段读了杨绛老师的《走到人生边上》，看到一个年届一百的老人，对人生存在很多很多的困惑，各种各样的疑惑，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些疑惑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态？这些疑惑好像在我看来，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我想知道态度应该放在怎样的位置？

凌越：

我是这么看的，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已经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了，刚才晓渔说得非常好，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读书，读本身就是一种方式，我也有这种体验，在非常舒适的日子里面，泡一杯茶看书，我觉得生活不过如此，就是这样。另外一个层次来讲，读书依然带有解惑这么一个具体的作用。对于具体问题的困惑，某些知识会帮助我解惑，这种动机是读书最朴素的动机，而不是为了要获得一个学位去读书。我读书的原因很简单——我喜欢，我好奇，仅此而已。

苏小和：

这个小姑娘这么小，提出的问题挺深刻的，也是挺难回答的。苏格拉底讲过一句话，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事实上你想这些问题，

我们知道杨绛老师一辈子其实从生活、功利的层面来讲非常不幸，今天来看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她的先生，她的女儿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对死亡思考是没有答案的，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讲是未知数，没有人知道死亡是什么样子。苏格拉底说得很好，人这一辈子最大的工作是认识自己，你这么小的年纪可以把苏格拉底这句话放在心里，人的荒诞感，人的虚无感，空虚感，无力感会一直陪伴你，但是没关系，我们在努力，我们在阅读，我们在思考。人的身体看上去很有限，就这么一点点，像尘土一样，可是内心世界非常宽广，人的梦想是无边界的，如果你有梦想的能力，相信你会看得更远。

提问：

我想问一下刘柠老师，问一下关于前卫艺术的事情，我自己有朋友在美术馆工作，我经常去798那边，我对现代艺术的理解，我个人是比较负面的印象，我认为艺术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外部的投射，有意义的东西，反应现实，反应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还有一部分对于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有自己内部结构的东西，这个画很好看，颜色布置地非常好，或者音乐有很好的旋律，这个旋律本身跟外部世界是没有关系的，可能用旋律唱一个爱情的歌曲，爱情和社会有关系，但是旋律本身是没有关系的。现在关注外部意义的东西，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参加一个艺术家的讲座，他做了一个作品，是在美国生活，春节的时候没办法回中国，正好正

对着地球的那一边是他的家乡，所以他做了一个现代艺术的作品，他把一个电视机，这个电视机对准了天空，在房间里挖了一个很深的洞，把电视机放在这里面，想表达我从世界这一端，看到那一端是我的家乡，只剩下意义了，但是结构上来说是很粗糙的，没有像古代了不起的画家有几年时间的积累，我个人对艺术的理解，必须有结构性的东西，必须有打动我的，让我感到意义很丰富，但是又说不出是什么东西结构性的东西，音乐或者是美术的。

第二，现代艺术我个人不太喜欢的，没办法评判好和坏，比如说印象派会有某种范式，现在的艺术我都是新的，今天弄一个雕塑，可能是一个人像，明天我弄一个铁架子，没法判断，因为没有同一个纬度，搞得是鱼龙混杂，而且作为欣赏者来说，也没办法判断，这个东西是好的作品还是不好的作品。虽然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自己对现代艺术是持一种不太欣赏的，但是我努力拓宽现代艺术的欣赏视野，我每次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但是每次都是失望的。包括海外华人的现代艺术作品，前段时间我去苹果社区看了一个作品，把一个衣橱，用机器设置成打开关上，我不知道它想表达什么，作为艺术家来说，你最擅长，你的功能是表达艺术的结构，无论外面有没有意义的综述，结构做得不好，你不是艺术家，应该把这个工作交给科学家和哲学家做，表达社会意义，事件意义的东西不是艺术家所擅长的，他擅长的是把这个意义和所擅长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现在

艺术结构的东西是丢掉了，我对此是比较失望的，想让你指点我一下，让我以欣赏的态度进入现代艺术馆去欣赏一些东西。

刘柠：

您提的这些问题，说明您对现代艺术已经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完全谈不上指点，分享一点个人的想法而已。我个人觉得意义、结构是基于古典主义，至少是现代主义时期的这样一种层面对艺术的理解。在现代主义后期，便开始呈现单方面沦丧的倾向，且越往后越明显。到了今天已经是后现代的后现代了，这种意义，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只是看

你怎么诠释，取决于观视者内心的价值和判断。结构呢，我觉得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就意义来说，举一个特别的例子，杜尚把小便池送到国家现代大展中的时候，说这就是我的作品，想表达什么意义？其本身就是对于用现代艺术的结构来表达意义这件事本身，对于社会趣味的一记耳光，告诉你所谓的“意义”是狗屎，只是表达了内心非常强烈的嘲讽而已。杜尚本身当然是有意义的，尤其是他的生活方式。他自己也说过，我的生活本身，我的人本身是最大的艺术，有过类似的表述。所以今天我觉得一些现代的——当然今天的艺术已经高度的后现代化了——



图为北京798

今天我们称之为当代艺术的，或者前卫艺术的，这样一种东西，实际上我觉得已经不拘泥于形式，他的表达形式甚至是去造型的，甚至只表达某种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见仁见智，因人而异的问题。两方面，意义与结构，或者说建筑于造型之上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已经彻底崩溃了，而且我甚至觉得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艺术到底是什么？你刚才也提到了苹果社区，应该指的是今日美术馆的那些展览，包括你去798、宋庄，越是成功的艺术品，越是大腕儿的艺术家，用的材料越庞杂，越昂贵，用的人工越多。用一个我非常敬佩的一位批评家，在《前卫之痒》中给我写序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汪民安教授，用他的话说，前卫艺术让你对它的意义，对于它的结构的思考，实际上都是纯主观的，一厢情愿的思考。你要问他这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者说为什么这么贵，他的解释是，它只是这样一种奢侈品。因为社会发展到今天，经济如此繁荣，财富极大丰富，就是要用当代艺术的形式，哪怕是纯粹的浪费，用大量的材料，大量的人工，就是表达这样的一种浪费。当然这不是他的原话，大意就是这样。像今天这种现代艺术，追寻它的意义，甚至还有一些人，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耳熟能详的对前卫艺术的质疑，说这个东西多恶心呀，哪里美啊等等，这是非常普通的对于前卫艺术通常的批判和质疑。但问题是，当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是把它置于艺术是美的这样一种纯审美的价值尺度的框架内，问题是今天艺术已经不是这

样的了。就跟我刚才说日本的冈本太郎，他对艺术的定义，艺术是不可以是好的，不可以是美的、漂亮的，不可以是让你感到舒服的。今天的艺术已经被这样定义的时候，确实我觉得艺术怎么说呢，它以哪种形式来表达，表达一种什么意义等等，这个确实已经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为什么说有些人是艺术家，有些人就不是艺术家，艺术又回到你刚才说的结构问题，艺术品作为一个系统，他有一个内在的结构，这种东西对于一个艺术家，可以有他过去一路走过来的符号系统，也可以打破这种符号系统，借助于一些其他的形式、手段、意象来表达。我认为作为艺术家个人来说，对于他所生活的当下这样一个环境，他应该始终保持某种姿态，保持一种清醒的问题意识。而且这种姿态，至少他创作的姿态应该是前卫的、先锋的，对于这样的东西，如果不是批评，不是激烈的批判，至少也应该是嘲讽的姿态。

今天前卫艺术由于商业上高度的成功，使这些艺术家为这些经济上的成功所束缚和捆绑，如果方力钧不跟某一个商业画廊签约，一年要交比如说50幅作品——当然方力钧有他的应对手段，底下是作坊式的运作——但是他可以打破既定的形象、符号的捆绑，像毕加索那样，从一种风格突变似的跳到另一种风格吗？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能的，因为画商不答应。画廊之所以不答应，因为画廊要拿着这些东西到佳士得拍卖的。中国艺术到今天已经丧失了作为前卫艺术应该保有的问题意识，一种前卫的姿态，事实上已经

退回到了像美国艺术批评家柏林伯格话语中的“后卫”艺术，实际上就是一种媚俗的，一种流行的，商业的，机械复制的，有一定程式化的，是基于一种虚假情感的东西，能够经济上获得很大的成功。所以这个问题你提的是前卫艺术非常本质的问题，相信正如对什么是前卫艺术，乃至什么是艺术这样一些问题一样，其实我觉得也不会有一个满意的答案，完全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提问：

首先我想问王晓渔老师一个问题，在我们所看历史当中的一方面，这样记录了一个，尤其是中国历史，一方面是记录详实的人物和事件，另外一方面又充斥各种各样的谎言，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来理解，就是一种政治的需要，从微观上来讲，是人性的体现。晓渔老师，你读历史过程中，是不是有从人性的角度去阅读，理解历史，如果有的话，其中有没有洞悉到人性的奥秘。另外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成庆老师，从你刚才所说的，我可以看到你这些年对生命的价值有非常深的思考，这其中应该是包含着很强的宗教情怀，我就想问一下，你对生命的终极意义有什么样的理解，同时想问一下，你是不是有比较明确的宗教信仰。

王晓渔：

关于历史的问题，中国历史当然很有趣了，读中国历史像读小说一样，与事实无关，与虚构有关，所以是很快乐的事情，你会发现

历史的叙事性超出小说的叙事性，小说往往写得很没劲，但是历史你不能想象的虚构性它全部存在。你刚才提到人性的问题，我个人也是同样如此。对历史一个事情的评判，我不以国家，不以民族，不以道德，不以阶层作为评判标准，就是以人性作为评判标准。

成庆：

我不大愿意公开谈信仰问题。如果说我到处宣扬，我想很多人会好奇的说，我也去看看佛教，或者其他宗教，但我想这一切都是因缘。我在美国呆了近一年，进了许多教堂，也喜欢古典音乐，尤其喜欢宗教音乐，但是我为什么没信基督教，这是一个因缘问题。我并不评判他们之间的高下，而是你的生命解决方案跟你从小提问题的方式有关系。我从小老是不由自主的问自己，为什么我生在现在，而不是在过去，也不在未来，你用佛教的观念很容易解释，因为佛教有三世，有轮回的概念。我只能跟你这么讲，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需求，有探索的冲动，人类的文明是无法脱离宗教的，这也是我反复在说，这30年内对于我们来说，生命教育是最缺乏的一环，我们生活中没有了宗教的痕迹，而宗教绝不是一种装饰，而是一种真正的生命体验。

苏小和：

我突然想起两个小故事，一个小故事是前苏联时代，有一个诗人写了一首很著名的诗《安魂曲》，当时因为言论没有自由，这首诗最后怎么保存下来的呢？是把那首诗分成

几个段落交给他的几个朋友，每一个朋友把它背下来，稍稍有一点解禁以后，再把这个作品还原，写在纸上，这也是一种独立阅读的方式。另外我想到一个故事，希特勒在全世界推行他的纳粹主义的时候，奥地利有一批音乐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每个星期五的晚上自己带着自己心爱的书去一个朋友家里就一个话题进行探讨，当时当地几乎没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全世界都是希特勒的声音。可是许多年以后，我们人类所怀念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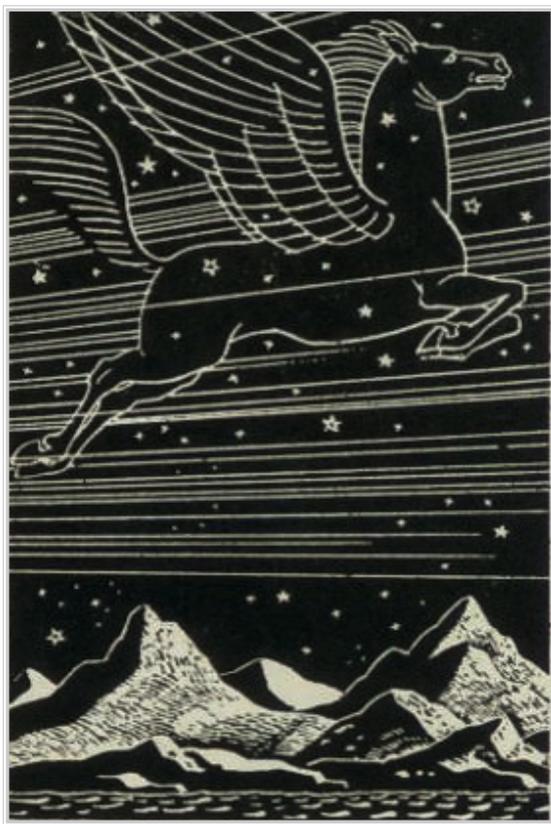
定是当时，包括韦伯一堆的人，希特勒今天只是一个笑柄。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独立阅读，我们都知今天的社会真的是推土机可以随时推倒我们房子的时代，孩子可以撞死在校车上，政府可以把最漂亮的校车送给外国人的时代，我们怎么坚守我们内心的风景，不因为这个时代的荒诞导致本人的荒诞，应该坚守我们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独立阅读，谢谢大家！



图为参加此次沙龙的各位独立阅读同仁。

从左至右依次是：凌越、孙骁骥、吴强、苏小和、灵子、成庆、刘柠、王晓渔、羽良、刘承周



夜行 肯特(美国)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鸣谢: 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 欢迎订阅, 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 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題, 敬請來信告知。

獨立閱讀討論區: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